

绪论

《新结构经济学导论》第一章

The Chapter I of Introduction to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林毅夫和付才辉【著】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讲义

2015/7/15 版草稿

反馈邮箱: fucaihui@nsd.pku.edu.cn

反馈微信: nsefch

[说明: 该版本仅为草稿, 尚未定稿, 存在诸多纰漏, 若需引用注明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讲义 (2015)。任何评论与建议特别受我们欢迎, 请不吝赐教, 请不要犹豫将反馈信息发到上述邮箱与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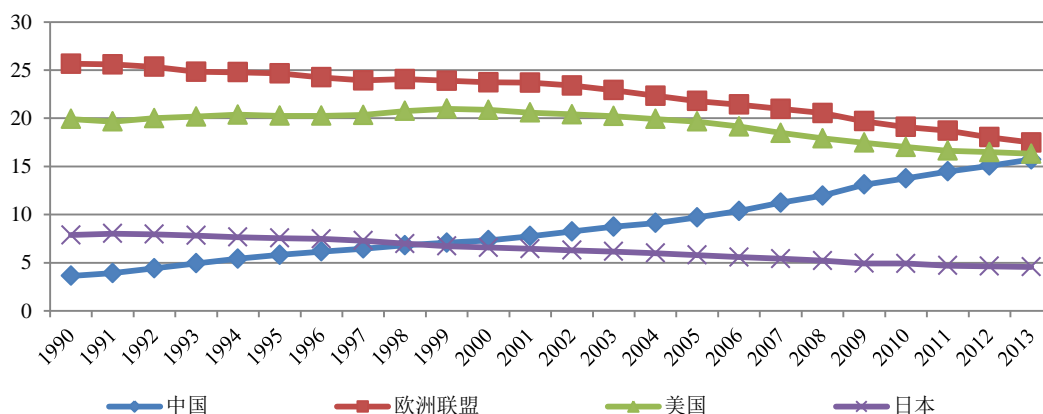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绪论.....	2
第 1 节 创建来自中国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	2
1.1 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学学科建设现状	2
1.2 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教育与教材建设状况	3
1.3 我国西方现代经济学学科教育与教材建设状况	4
1.4 编著本书的目的	5
第 2 节 新结构经济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6
2.1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背景	6
2.2 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过程	8
2.3 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取向	10
2.4 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12
第 3 节 新结构经济学体系：结构的科学	15
3.1 新结构经济学体系如何构建	15
3.2 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18
3.3 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及其理论贡献	20
第 4 节 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子领域概述	22
4.1 新结构产业经济学	22
4.2 新结构劳动经济学	25
4.3 新结构金融学	27
4.4 新结构区域经济学	29
4.5 新结构国际经济学	31
4.6 新结构经济周期理论	32
4.7 新结构转型经济学	33
4.8 新结构制度经济学	35
4.9 新结构国际发展学	37
4.10 新结构经济学对其他结构问题的研究	39
第 5 节 本书的内容安排和使用说明	39

第一章 绪论¹

第 1 节 创建来自中国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

1.1 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学学科建设现状

社会科学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就越大。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越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成就。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英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上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生长或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多出于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也逐渐出自美国。²我国自 1979 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6.8 亿人脱贫，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并在 2009 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0 超越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2013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以 PPP 计算 2014 年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³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也将随之提高。



数据来源：根据 WDI(2014)计算，按购买力平价 (PPP)衡量的 GDP (2005 年不变价国际元)。

图 1.1 中国、欧盟、美国与日本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 (%) 比较

经过长足的发展，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成就斐然，在社会科学领域独占鳌头。按照教育部最新的学科分类目录，我国目前的经济学学科建设涵盖了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和十六个二级学科，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经济学学科体系。根据教育部最新的数据，2013 年普通本科经济学毕业生人数达到 193530 人，占总毕业生人数的 6.05%；经济学招生人数达 223473 人，占总招生人数的 5.86%；经济学在校生人数达 882890 人，占总在校生人数的 5.91%；预计毕业生人数达 210209 人，占总预计毕业生人数的 6.01%。2013 年经济学研究生毕业人数达 23226 人，占总毕业生人数的 4.52%，其中经济学博士生毕业人数达 2328 人，占总博士生毕业人数的 4.38%；经济学研究生招生人数达 28007 人，占总招生人

¹ 本章也曾以名为“构建我国自主创新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综述、架构与展望”的综述文章首次刊登在《制度经济研究》(2015 年第 4 期)。

² 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经济研究》，1995 年第 10 期，第 13-17 页。

³ 林毅夫等 1994 年首次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成功地预测到了该历史事实。

数的 4.54%，其中经济学博士生招生人数达 2919 人，占总博士生招生人数的 4.58%；经济学研究生在校生人数达 77548 人，占研究生总在校生人数的 4.32%，其中经济学博士生在校生人数达 12612 人，占总博士生在校生人数的 4.23%；经济学研究生预计毕业生人数达 29548 人，占总研究生预计毕业生人数的 4.44%，其经济学博士预计毕业人数达 6325 人，占总博士生预计毕业人数的 4.3%。

然而，与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学人才培养现状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思潮和发展方向的影响还很有限。现有的学科架构和人才培养体系主要源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传统和西方经济学学科传统，尚未形成基于我国以及与中国具有类似特征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转型经验的自主创新学科体系。然而，随着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在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形成自主创新学科体系的需求和条件也将日趋成熟。作为自主理论创新的典型代表，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是来自中国、很可能影响世界的理论体系，对推进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意义重大。本章将对我国经济学学科发展脉络进行简要梳理，在此基础上简要概述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背景、研究取向、研究范式、学科架构、研究体系与研究进展以及未来展望。⁴

1.2 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教育与教材建设状况⁵

建国以后，由于与前苏联面临相似的条件和发展战略目标，我国走上了计划经济体制。⁶对应地，我国的整个经济学学科体系也主要从前苏联引进。1954 年前苏联正式出版了第一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材，1955 年就被翻译引入我国。这套教材在马克思《资本论》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总结了苏联赶超战略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的经验。

1956 年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强调要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来建设社会主义。受此影响，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于光远、林子力和孙冶方等便从 1956 年开始系统研究苏联教科书，结合中国国情引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我国开始停止使用苏联教科书，掀起了新一轮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运动。影响较大的代表性教材包括 1961 年于光远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和姚耐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以及 1963 年成稿的徐禾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其后的十年文革几乎中断了我

⁴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主要收录了阐述新结构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和政策应用的代表性论文，林毅夫其他概述新结构经济学的文章对其核心思想也做了简介，亦有大量对新结构经济学进行专题辩论和评论的文献（可参考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 年第 2 期克鲁格(Krueger)、罗德里克(Rodrik)、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的评论和林毅夫的回应；*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09 年第 5 期林毅夫和张夏准(Chang)的辩论，以及 2011 年第 3 期上围绕新结构经济学“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F)的专题讨论；《经济学季刊》2013 年第 3 期韦森、张曙光、余永定、黄少安、张军等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评论与林毅夫的回应；《经济资料译丛》2013 年第 1 期文一和王勇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评论；《南方经济》2014 年第 1 期付才辉的评论；《经济政策改革》(*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2015 年第 1 期关于转型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的关系所做的专题讨论)。

⁵ 关于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与研究的演进，邓慧萍、何爱平和任保平做了不错的评述（邓慧萍：《我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历史演进》，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何爱平、任保平：《新中国 60 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 年第 7 期，第 29-35 页）。

⁶ 事实上，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全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设想的方式进行的。1921 年到 1924 年根据列宁思想进行的新经济政策使得苏联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但当时苏联的工业化比重仍然很小，农业经济依然占主导。如何实现苏联的工业化，出现了“协调发展派”和“超工业化派”之间的争论，在 1929 年通过的五年计划之后，苏联走上了重工业赶超战略之路。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等大多认为中国建国后是完全照搬照抄苏联模式，但林毅夫等认为由于中国与苏联面临类似的条件或选择空间，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具有与前苏联类似的过程与结果（林毅夫、蔡昉和李周，2014，第 25 页）。从《中国的奇迹》一书开始，新结构经济学便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认识，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赶超战略，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其他采取赶超战略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内生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

国经济学学科建设。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于为经济建设解放思想的需要,开始反思传统苏联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掀起了重新解释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热潮。1979 年孙冶方在《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中,率先对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提出了质疑,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基础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批判,并于 1983 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经济论稿》。1979 年许涤新出版了《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结合《资本论》原著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过我国一大批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有中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影响较大的代表性教材包括北方十三所高校编写、谷书堂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1979 年第 1 版)和北方十四所高校编写、魏埏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1986 年第 1 版)(即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北方本”);南方十六所大学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1979 年第 1 版)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1980 年第 1 版)(即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南方本”);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吴树青、卫兴华、谷书堂和吴宣恭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93 年本,即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委本”)。蒋学模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 年本)、厉以宁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 年本)等也有较大影响。进入 90 年代以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打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体系,融合性地阐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的代表性作品包括张维达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99)、程恩富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2000)、逢锦聚和洪银兴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2002)。主要的经济学院系也均建立了政治经济学专业。

随着新时期经济建设的变化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冲击,如程恩富、林岗、张宇、马艳、蔡继明等等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创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建设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入新世纪之后,全国各个高校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的研究和教学。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相应的学科建设逐渐成为常态,在官方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⁷

1.3 我国西方现代经济学学科教育与教材建设状况⁸

1901 年,严复翻译出版斯密的《国富论》标志着西方经济学开始在中国的传播。早在建国之前就涌现了马寅初、陈岱孙、张培刚等等一大批我国早期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但是建国之后,我国走上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学科主导,西方经济学受到批判,高等院校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被取消。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在反思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下,对西方经济学全盘否定的态度开始松动,相关部门也指示让广大青年学子了解外部世界的经济情况和

⁷ 除了因意识形态优势而备受官方特殊重视之外,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也确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脉络的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现实条件和实现机制问题的耕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和内在规律的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思想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性质的读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的开掘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汪信砚, 2008)。

⁸ 对于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黄范章做了不错的梳理(黄范章:《建国六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上/下)》,《金融发展评论》,2010 年第 1 期,第 147-158 页;2010 年第 2 期,第 109-132 页)。马涛从价值观念和理论逻辑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结构及其演变做了比较全面的评述(马涛:《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结构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0 期,第 41-61 页)。

经济理论的实际情况。当时组织编写了两本西方经济学教材，一本是由人民大学的鲁友章与李宗正主编的关于西方经济学史的《经济学说史》，上册于 1964 年由人民出版社发行，下册直到 1982 年才出版；一本是由北京大学的罗志如、社科院的巫宝三和人民大学的高鸿业主编的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于 1962-1965 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化大革命不但中断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中断了西方经济学的传播。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于为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迫切需要，掀起了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热潮。1979 年由北京大学的陈岱孙为首的 17 位研究西方经济学及经济学说史的经济学家发起了“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组织创办西方经济学讲座，出版讲座文集，重新启蒙西方经济学。一些影响较大有代表性的著作与教材如张培刚和厉以宁合著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1980 年本）、胡代光 and 厉以宁合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1982 年本）、刘路源和谭崇台合著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1983 年本）、宋承先编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上下册，1988 年本）、高鸿业和吴易风合著的《现代经济学》（1989 年本）、罗志如和范家骧等合著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上下册，1989 年本）等等。与此同时，我国出版界也不遗余力地翻译引介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和教材，例如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西方古典经济学代表作以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西方权威入门教材，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均组织翻译出版了系列西方经济学重头著作以及《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各种《经济学手册》等经济学辞书和西方流行教材。以《经济研究》为代表的国内重要的经济学期刊不仅翻译介绍西方经济学家的著名作品，还发表了大量我国经济学家尤其是当时的中青年经济学研究者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国内重大经济问题的学术成果。大量青年学生也到西方国家留学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以林毅夫、邹恒甫、张维迎、田国强、钱颖一、洪泳淼等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学成后陆续回国创办新研究机构，组织留学人才开始系统讲授西方经济学，以“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为研究取向，开始努力推动中国经济学界与国际接轨（林毅夫，1995）。目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院系均开设有西方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专业，从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的海归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队伍国际化的主力。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努力，我国经济学研究队伍在研究方法上已经与国际接轨，研究成果不断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⁹（林毅夫，2001）。主要高等院校的经济学学科建设基本上已经按照国际标准铺开。诸如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西方新涌现的经济学流派也被迅速引进国内，不断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进展更新我国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在与国际经济学范式接轨的同时，我国经济学家用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也取得了大量研究中国经济乃至一般理论性问题的原创性学术研究成果，开始产生一定的国际影响，比如新结构经济学。¹⁰

1.4 编著本书的目的

自科斯提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忠告以后，“思想市场”一词在国内学界成为一个热门词汇。¹¹学者的工作是提出或介绍新的思想，并通过著作、文章、讲演使新的思想成为社会思潮，以引领社会变革的方向。《新结构经济学导论》编著的目的希望能够逐步改变我国经

⁹ 在 2012 年的 Tilburg Economics Ranking 所有期刊发表文章排名中，大陆有 3 所高校经济学学科进入全球，上海财经大学共发表 27 篇文章位居世界第 65 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共发表 20 篇文章位居世界第 100 名。

¹⁰ 林毅夫是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新结构经济学对国际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¹¹ 林毅夫在 2007 年的马歇尔讲座上对思潮做了专章的讨论，后来出书时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为书名来彰显思想的重要性。诺奖得主舒尔茨在研究近三百年来西方各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时发现：“主流社会思潮塑造社会的制度化秩序……并且，业已建立的制度的失灵反过来会改变社会思潮”。我们所处的社会有许多制度失灵和缺位，确实需要有新的思潮来催生新的制度。不过，舒尔茨也发现，“近三百年来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进行的重要社会变革绝大多数是失败的。”

济学教育界思想市场还不够充分竞争的现状，加强我国经济学学科的自主建设。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的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尚未有成功的例子、而极少数成功的经济体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都是不正确的事实面前，中国的思想市场是否应该只引进各种发达国家的大师提出的思想？中国的学者在引进西方大师的思想时，是否还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来观察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现象和问题的本质，提出我们自己的思想？科斯在提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警告时，先说了一段：“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发展的成绩不是在西方主流的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所以，科斯的原意不是中国学界缺乏从西方引进的各种思想，中国所缺乏的是从深入了解自己过去这三十年的成功经验以及未来的机遇和挑战的本质中总结出来的新思想吧！如前所述，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近 200 个发展中国家尚无根据西方主流思想而发展成功的先例，科斯指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是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是否也是警告中国的学界需要放弃一种思维模式：一看国家社会出现了问题，就去西方现有的主流理论或大师所写的故纸堆中对号入座，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自己去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和原因，从而自己提出解决办法呢！¹²

第 2 节 新结构经济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2.1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背景¹³

在全球长期经济发展中，跨国收入差距的历史呈现出“大分流”模式。据 Pritchett 估计，从 1870 年至 1990 年，最富裕的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之间生活标准的差距比例增长了 5 倍以上。¹⁴根据 Maddison 的估计，从 1950 年至 1998 年，最富裕的收敛群体和最贫穷的收敛群体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比例增长了 1.75 倍¹⁵，而按照 Mayer-Foulkes 的估计，这个比例增长了 2.6 倍¹⁶。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 2008 年只有我国台湾和韩国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进一步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只有十三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是原本和发达国家差距就不大的西欧周边国家，其他 180 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长期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Agenor et al., 2012）。¹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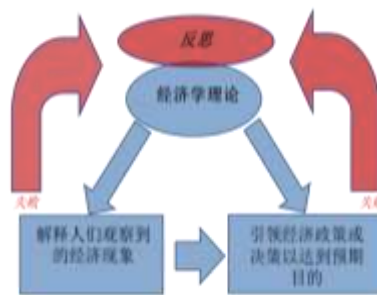


图 1.2 我们为什么要反思

面对如此糟糕的发展绩效，伊斯特利（Easterly, 2005，第 1-2 页）以散文家的口吻写道：“50 年前，二战刚刚结束，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了热切的寻宝之旅，我们希望能找到灵丹妙药，让热带雨林国家也能像欧洲和北美的富国一样富有。穷国人民的苦难和富国人民的享乐形成鲜明的反差，这激励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如果能够成功，这将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辉煌。同过去的寻宝者一样，经济学家试图找到一个法宝能让穷国变富。许多次，我们

¹² 林毅夫，《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金融时报》，2014 年 8 月 13 日。

¹³ 林毅夫很好地回顾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20 周年序言，2014 年版）。

¹⁴ Pritchett, L., “Divergence, Big Time”, *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 11, 1997, 3-17.

¹⁵ Maddison, A.,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2001.

¹⁶ Mayer-Foulkes, D., “Global Divergence”, Documento de Trabajo del CIDE, SDTE, 2002.

¹⁷ 这些相关的特征事实我们将在第二、三章做进一步的介绍和呈现。

都认为已经找到了灵丹妙药，从外国援助到直接投资，从扶持教育到控制人口，从根据改革状况提供贷款到根据改革状况减免贷款，不幸的是，一切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那些接受我们药方的穷国没有取得意料中的进步。在我们最花力气的地区——非洲撒哈拉，经济根本没有增长；拉丁美洲和中东一度有增长，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重新陷入贫困的陷阱；南亚是另一个备受经济学家们关注的地区，无规律的经济增长使那里集聚了大量的贫困人口；最近，东亚，我们曾为之欢欣鼓舞的经济新星，也陷入了增长泥潭（一些国家但并非全部国家正在复苏）。除了热带雨林贫困国家，我们还试图将一些做法应用于前社会主义国家，但结果也非常令人沮丧。就像很多宣称找到仙丹的无稽之谈一样。”

与全球经济发展的糟糕绩效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自 1978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 36 年年均 9.7% 的高速增长，从一个人均收入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数三分之一的贫穷落后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2014 年人均收入达到 7600 美元，期间 6.8 亿人脱贫。在一个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的国家维持了这么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取得了这么多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中国有可能是继中国台湾、韩国之后第三个从低收入步入高收入的经济体。

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照搬西方主流理论倡导的“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而是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发展观，根据中国的国情，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外不少人把中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进行改革所致，对中国的道路和制度存疑。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按照西方主流理论进行转型的苏联、东欧和亚非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少数在转型中取得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国家推行的却都是渐进的改革。并且，出现在中国转型期的收入分配不均、腐败等广受人们诟病的问题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更为严重。

根据西方主流的理论来进行转型和发展的国家不成功，而少数成功国家的转型和发展的道路却违背了西方主流的理论。如此巨大的实践反差，给予了新结构经济学巨大的理论创新动力和理论创新的机会。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总结，总结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理。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也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如果未能认识到发达国家主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必然存在的局限性，照搬这些理论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结果经常会事与愿违，以此为参照系来观察社会则经常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变为社会批评家而难于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只有总结于我国自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败经验的理论创新，才能真正揭示我国过去的道路能够在转型期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原因，以及问题的根源、解决的路径和所需的制度保证”（林毅夫，2014）。

因此，我们需要以常无的心态对待教科书的理论。¹⁸任何经济学理论如果不能有效解释人们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或者不能引领经济政策或决策以达到预期目的，就应该予以反思。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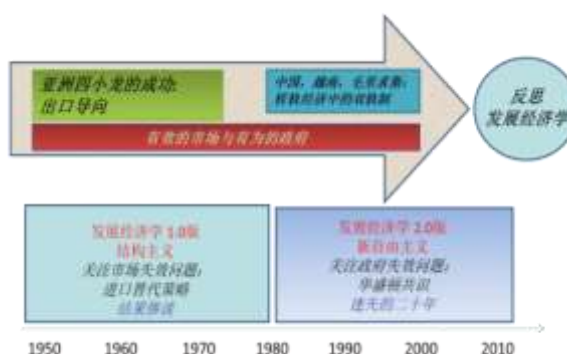


图 1.3 发展理论急需反思

¹⁸ 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可参考林毅夫的《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对话》。

¹⁹ 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本身就是处于不断反思的过程中，可参见杰拉尔德·迈耶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4)主编的《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尤素夫(Yusuf, 2008)主编的 *Development Economics*

2.2 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过程²⁰

新结构经济学的雏形是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于 1994 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对于该书的写作背景，林毅夫回忆道：“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地区，人多、自然资源少，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具发展希望的地区。然而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成为第一个非白种人的高收入经济体。接着东亚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也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这些事实面前，世界银行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起每隔 4 年对东亚经济进行一次主题研究，概括其独特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揭示既定时期的问题与挑战。这个系列研究中的第一个报告发表于 1993 年，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首次系统研究了东亚 8 个经济发展表现卓尔不群经济体的成功原因。这 8 个经济体除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外还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虽然从 1978 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到 1993 年，中国已经取得了 15 年年均 9.7% 的高速增长，在一个底子薄、人口超 10 亿又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取得这样的成绩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但是《东亚奇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作为中国的经济学者，我们义不容辞地以‘中国的奇迹’为题，分析了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道理，预测了这个奇迹是否有可能持续，探讨了如何深化改革才可以将之继续保持下去”（林毅夫，2014）。

《中国的奇迹》一书系统阐述了建国以后我国重工业赶超战略与当时经济发展的禀赋特征之间的政府干预矛盾，揭示了扭曲价格的宏观经济政策、资源计划配置与剥夺微观主体自主权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形成机制，用比较优势战略对东亚奇迹进行了重新解释，分析了改革开放之后发展战略转轨为比较优势战略与当时劳动力相对资本富裕的禀赋特征之间的相容，总结了发展战略渐进式转型的经验。²¹事实上，差不多与西方主流内生增长理论与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处于同一时代²²，《中国的奇迹》一书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以禀赋结构的供给与需求、企业自生能力为核心内容的一般均衡理论。

through the Decades: A Critical Look at 30 years of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以及各个版本的发展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²⁰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作为出版界专家，亲身编辑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多部重要著作，从另一个角度回顾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过程（陈昕（主编）：《“中国奇迹”20 年——滴水湖会议实录》，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陈昕：《林毅夫与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载于《读书》2015 年第 1 期。

²¹ 据林毅夫回忆，《中国的奇迹》一书的研究始于 1988 年下半年。当时中国出现了 1949 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高达 18.8% 和 18.5%。面对高通货膨胀，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开出的药方是提高利率水平以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但是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以行政手段直接砍投资、砍项目来抑制需求。这种措施造成了许多半拉子工程，从主流的理论来看甚不理性，但是在 1978-1988 的 10 年间中国政府却能在转型过程中取得年均 10.1% 的高速增长，如果中国政府真是不理性的，显然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增长绩效，可见主流理论不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究其原因，主流理论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前提下的，而转型中的国家并不存在完善的市场。我们在参与这场讨论的过程中，还注意到，周期性的“活乱”循环现象是中国经济的痼疾顽症，而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方面的改革，则使这种“活乱”循环现象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所以，不抛弃完善市场的前提，并从传统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以及导致经济陷入困境的根源上进行探讨，就难以理解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对症下药地提出有效的对策。循着这个思路，我们的研究深入探索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中各种制度安排形成的内因，并逐步拓展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各个主要领域（林毅夫，2014）。

²² 为了对比新结构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时间，这里有必要简要梳理一下西方主流增长与发展理论的脉络。从 1776 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开始，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有两个里程碑式的标志。1874 年瓦尔拉斯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开创了今天经济学教科书基本框架的一般均衡理论，企图证明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看不见的手”。无奈那个时代的数学水平很有限，瓦尔拉斯证明错了。1954 年，德布鲁和阿罗利用数学家的成果“不动点定理”给出了一般均衡存在性的数学证明。1929 年，大萧条的爆发打破了古典一般均衡理论，诞生了以总需求为核心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其后的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以哈罗德-多玛（Harrodo-Domar）模型为代表的早期开拓者使用一些基本变量构建了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总量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他们试图使用里昂惕夫生产函数中资本和劳

新结构经济理论体系的第二个里程碑著作是根据 2007 年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出版的《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该书以《中国的奇迹》一书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将基于中国经验提炼的理论推广到全球历史背景下，以发展战略遵循还是违背比较优势为出发点提出了发展与转型一系列可验证的假说，并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各个假说做了经验检验，绝大部分实证结果符合理论预期（林毅夫，2008）。

“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一词由林毅夫提出和倡导。²³2009 年 6 月林毅夫于其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一个内部研讨会上，以他 1994 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 2007 年的马歇尔讲座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反思了自二次大战以后发展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以来的理论进展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与转型的成败经验，指出第一版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重视政府的作用而忽视市场的作用和第二版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重视市场而忽视政府作用的偏颇，提出以“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版，强调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场”也要有“有为的政府”。2011 年 3 月，林毅夫应邀到耶鲁大学做著名的库茨涅茨年度讲座，以“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为题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演讲全文发表于 2011 年出版的《世界银行研究观察》第 26 卷第 2 期，向经济学界正式宣告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诞生。2012 年，林毅夫在世行的工作结束前将新结构经济学的有关论文集结为《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Policy*)一书，系统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理论逻辑、方法框架与政策主张。基于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经验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观察，林毅夫出版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一书，对新结构经济学原理与应用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系统阐述。在上述三部新结构经济学的代表性作品之外，在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上展开的大量详实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整个理论体系做出了坚实的支撑。²⁴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更加侧重于禀赋结构供给与需求的静态一般均衡，红线是赶超战略下重工业的禀赋结构需求与当时中国禀赋结构供给的矛盾。《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一书则将《中国的奇迹》的分析框架扩展到了全球的历史经验。其后衍生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更加侧重于禀赋结构供给与需求的动态一般均衡，红线是禀赋结构升级和生产结构升级相辅相成的动态过程。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便可以称为结构变迁的价格理论。

动的不可替代性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在此基础上，1956 年，索罗(Solow)使用了资本和劳动可替代的标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建立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基准索罗模型，激起了第一波对经济增长的系统分析。紧随其后，60 年代中期，卡斯(Cass)和库普曼斯(Koopmans)通过内生储蓄率完成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其后，70 年代以 AK 模型为代表的外部性增长理论认为，当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等各类资本的总和被积累时，正的外溢作用使得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边际报酬递减被突破，长期增长成为可能。20 世纪 80 年代末与 90 年代初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模型完全竞争的假定，标志性的理论突破是 1989 年的罗默(Romer)模型和 1992 年的阿洪(Aghion)与豪伊特(Howitt)的熊彼特模型，认为中间产品种类扩张以及质量改进等创新是研发投入的结果，激励机制在于持续创新的垄断租金。经济增长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大致可以归结为上述三种基本范式(阿洪与豪伊特，2009)。林毅夫和罗森博特(Lin & Rosenblatt, 2012, table 4) 也概括性地梳理了更加广泛的发展思想，可供参考。

²³ 按照经济学分类方法，用现代的、新古典的方法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应该称之为“结构经济学”。将它称为“新结构经济学”，主要是因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称其为“新结构经济学”，便于同结构主义相区分。这样的做法在现代经济学里也有先例。道格拉斯·诺斯在 1960 年代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将其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以便同 20 世纪初期在美国盛行一时的“制度学派”区分开。

²⁴ 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收录在林毅夫等编著的《新结构经济学文集》中。

2.3 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取向

新结构经济学遵循了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所倡导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从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它的决定因素入手，而不是以《国富论》所主张的分工为切入点来研究。²⁵

经济快速增长的现象是在 18 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18 世纪以前西欧国家人均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0.05%，人均收入需要 1400 年的时间才能翻一番。18 世纪以后到 19 世纪中叶，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 1%，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缩短到 70 年。从 19 世纪中叶到现在，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 2%，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降至 35 年。上述增长加速的现象是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的结果。²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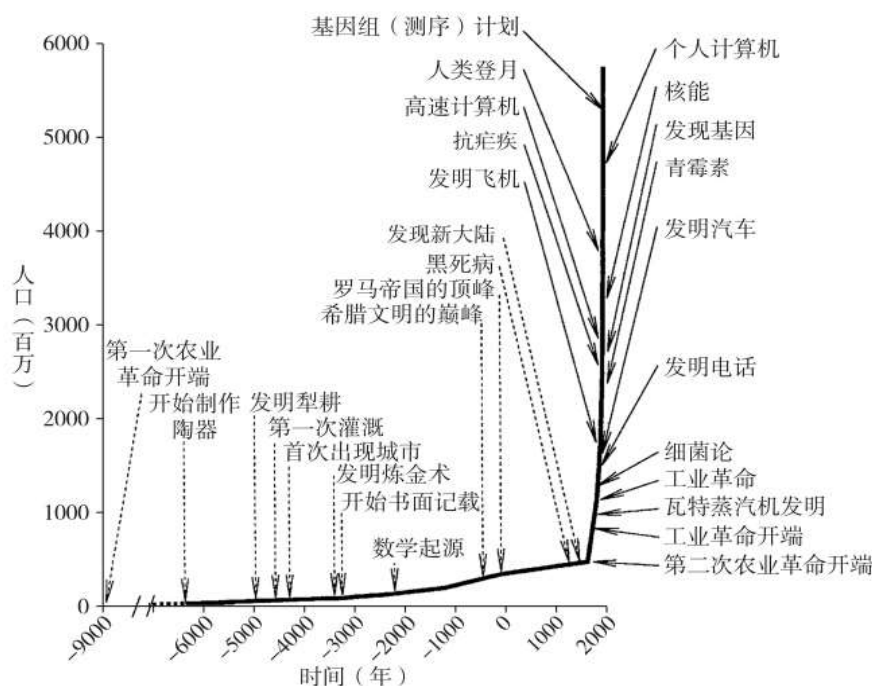


图 1.4 世界人口增长与技术史中的一些主要事件

资料来源: Fogel, R. W., "Catching up with the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1), 1999, 1-21.

因为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不断加速,主要决定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其前提则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速度的不断加快。由此带来的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则对硬的基础设施如电力、道路、港口的改进提出了要求,这是让现代生产得以进行和将产品销售到更为广阔的国内外市场的必要条件。而交易范围的扩大,则导致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不断增加,于是合同和法律就变得很重要。同时,为了满足产业规模和资本密集度提高所需的资本,金融体系也必须不断提高其动员资金和分散风险的能力,同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软的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完善,这样交易成本才会降低。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以及和产业、技术相适应的硬的基础设

²⁵ 《国富论》出版于 1776 年,是斯密研究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后,工业革命尚未发生前,国际贸易盛行时期的经济现象的著作,所以,他强调市场、分工等。而现代的快速经济增长则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斯密不可能超乎时代,对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原因有先见之明。实际上,市场范围的扩大与分工深化只是结构变迁众多维度的一个表现而已(付才辉, 2013, 2014)。

²⁶ 经济史学家乔治·克拉克甚至宣称:“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 1800 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新经济史家福格尔(Fogel, 1999)将技术史中的一些主要事件与世界人口增长绘制在一章图谱中可以非常直观地说明这一点,如图 1.4。更多的特征事实将在第三章予以介绍。

施和制度（软的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的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

尽管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相同，但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禀赋结构不同，相应也会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其要素禀赋结构一般会呈现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同时资本相对稀缺的特点，因而生产也多集中于劳动力或资源密集型产业（主要有维持生存的农业、畜牧业、渔业和采矿业），采用传统的、成熟的技术，生产“成熟的”产品。除了矿业和种植业，这些生产活动很少有规模经济。这些国家的企业规模一般而言相对较小，市场交换往往也不正规，通常仅限于在当地市场上跟熟人进行交易。这种生产和交易对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要求不高，只需要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初级的基础设施就可以了。位于发展阶段谱线另一端的高收入国家，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禀赋结构图景。这些国家相对丰裕的要素不是劳动力，也不是自然资源，而是资本；因而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各种硬件（电力、通信、道路、港口等）和软件（法律法规体系、文化价值系统等）等基础设施也必须与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市场活动相适应，这种情形下的市场交易是远距离、大容量、高价值的。结构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每一阶段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点。新结构经济学试图构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框架，来理解人们在结构变迁过程中观察到的、关于持续增长的各种特征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如下：建立一个分析架构，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考虑在内；分析政府与市场在不同发展水平上的作用、以及从一个水平向另一个水平的转换机理；分析经济扭曲出现的原因，以及政府为退出扭曲应该采取的措施。

现有的主流理论都来自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他们的技术和产业都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对于他们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只能自己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大多处于世界的前沿之内，他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有后发优势。并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动员的资源、面对的各种要素价格、风险因素和软硬件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也不一样，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政策和制度不见得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忽视了这种差异性，是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而极少数能够成功的国家他们的发展政策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原因。发展中国家的适宜性目标不一定非得是最前沿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因此，如何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性质的具体差异对应地提出适宜的前提假设、定义适宜的核心概念、构建适宜的模型、推演出适宜的理论命题、进行适宜的实证检验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取向。在发展与转型的动态过程中，既涉及到一般性的结构变迁原理，又涉及到诸如产业结构、国际发展、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金融结构、制度安排、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城市化、经济周期等一系列重大的议题和具体研究领域。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和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核心概念与分析框架系统研究上述具体议题和领域便构成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子领域。

过去几十年中，有一些分析框架曾主导着人们对于发展的思考，却同各国的经验事实鲜有联系。新结构经济学的努力方向，并不是用另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政策框架来替代它们，而是考虑各国的禀赋结构和发展水平，提出一条因国而异的、严谨的、有创见的、对于发展政策来说切实可靠的路线。这一框架强调，应更好地理解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同发展水平上结构差异的影响，尤其是涉及适当的制度与政策，以及结构转变过程中私人部门面临的各种约束与激励的方面。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研究议程应该能深化人们对发展本质的理解。

总之，在研究取向上，新结构经济学提倡应该回到斯密所倡导的对现象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按这个办法对我们的国家社会所出现的问题自己独立进行研究来得出自己的分析、观点和解决办法。斯密、熊彼特、凯恩斯、科斯、哈耶克等大师都是以这种方法来研究他们所在的社会、所处的时代的问题而得出他们的观点和理论贡献的（林毅夫，2014）。

2.4 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没有哪个经济学领域像经济发展那样在其主要范式上经历了那么多意外的变化。发展经济学的曲折经历对发展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主要的发展范式决定了与政府在经济中的理想作用、政府干预的程度、干预的形式和方向以及政府—市场互动的实质等问题有关的政策处方”（阿德尔曼，2004，第73页）。

“发展经济学的主要范式之所以存在很多突然的变化，其根本原因一直就在于人们总是想为不发达找出一个单一的原因（从根本上说，这是错误的），并由此找到一种单一的解决办法，即发展理论。根据“简单，否则就是愚蠢”的原则，一种特殊的论证方式被创造出来了，而且这种方式基本上不曾变化，即不发达是由于要素 X 的制约；解决了 X，发展就是必然的结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从过去的失败和成功中吸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同，以及对上面所列的范式变化的其他根源所做出的反应也不同，因此对什么是要素 X，答案是大不同的……，人们关于最佳形式的国家-市场互动关系和一些主要的政策杠杆建议也是如此。寻找发展的惟一法宝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因为它的基础是一种简单的机械主义发展观和体制观。但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人们像术士寻找点金石一样寻找着要素 X，这种现象一直左右着经济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证研究……，X 等于有形资本（1940-1970 年）、X 等于企业家精神（1958-1965 年）、X 等于不正确的相对价格（1970-1980 年）、X 等于国际贸易（1980 年—）、X 等于强有力的政府（1980-1996 年）、X 等于人力资本（1988 年—）、X 等于无效政府（1997 年—）”（阿德尔曼，2004，第 74-82 页）。这些具体的西方主流理论事实上都是以发达国家作为标杆分析发展与转型的要素与结果。²⁷

归结起来，发展经济学的前两波思潮也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如第一波结构主义思潮所强调的现代资本、技术密集产业），或发展中国家做得不好的地方（如第二波新自由主义思潮所强调的治理，即华盛顿共识所推动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并以此作为改造发展中国家的依据。旧结构主义忽视发展中国家禀赋特征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重要影响，低估了市场在结构变迁中的力量，高估了政府在结构变迁中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没有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系统性扭曲，内生于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低估了政府在结构变迁中的力量，高估了市场在结构变迁中的作用。这两波发展思潮均未能有效地指导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少数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的经济体，也都未遵循这两波主流发展思潮。与前两波发展思潮不同，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应该从发展中国家现在有什么（即其要素禀赋）出发，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即其比较优势），并规划把现在能做好的做大做强，以此实现逐步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目标。与以发达国家作为标杆分析发展与转型的要素与结果的研究范式不同，突出发展与转型方法和过程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更加实事求是地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的成因，提出求真务实的对策。

如下两份报告的比较可以形象地体现出新结构经济学范式与主流 X 理论范式之间的鲜明差异。如图 1.5 所示，当今风靡全球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便是“发展要素/结果导向”思想的经典之作，其以最发达的经济体作为参照，通过 12 根标杆从各个方面来评价各个经济体，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或发展中国家做得不好的地方，其评价结果便是将发展阶段分为三个阶段两次转型。新近版本的《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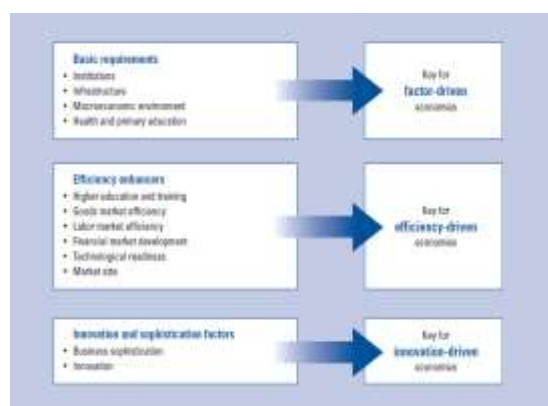
²⁷ 经济增长论文通常都是先提出一个理论，紧接着是实证部分。实证部分将证明，当其他变量不变时，刻画该理论强调的现象的变量与增长相关。论文一般还会接着证明，甚至当解释变量出现变动时，理论强调的变量也具有显著性，即理论的稳健性。那么，究竟哪些变量应被纳入到回归分析中呢？可惜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没有精确到足以指出增长的确切的决定因素，几乎没有什么变量是特别稳健的(Levine & Renelt, 1992)，甚至时常出现“王婆卖瓜”甚至相互矛盾估值(萨拉-伊-马丁, 1997; 巴罗(Barro)和萨拉-伊-马丁, 2004)。

球竞争力报告》由西方甚至全球最经典教科书之一《经济增长》²⁸(*Economic Growth*)一书的作者之一萨拉-伊-马丁(Sala-i-Martin)作为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领衔按照 X 理论范式下跨国回归的思路设计。²⁹

与之不同,林毅夫和付才辉(2014)最近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编撰的一份研究报告手稿《世界经济结构转型报告(2014)》便以“发展方法/过程导向”追踪了各个经济体转型升级的路径。基本的做法如图 1.6 所示,从每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的自身禀赋特征出发,从事符合此时由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的活动(如创新、生产、分工、城市化等等),活动产生的剩余便最多,最有利于禀赋结构的提升;当禀赋结构升级之后,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再从事更高级的符合变化了的比较优势的活动;如此循序渐进、小步快跑地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这种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方法对于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看起来或许是缓慢而令人沮丧的。但事实上,这种办法却是积累资本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最快方法;并且,只要能得到更为发达的国家已经开发出来且依然存在于这些国家的技术,并进入这类产业,其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还可加快(林毅夫,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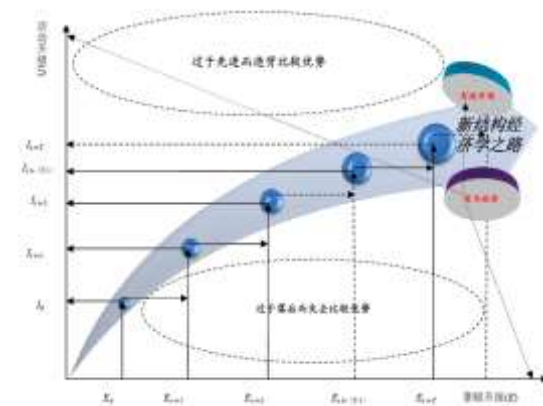
对比可以发现,发展要素只是发展方法选择的对象,发展结果只是发展过程的结局。如图 1.7 所示,以韩国、中国、孟加拉国为例,按照主流 X 理论范式,在 2011-2012 年度从最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在 142 个样本经济体中,韩国综合排名 24 位,中国排名 26 位、孟加拉国排名 104 位。按此做法,那么韩国在二战之后的状况可能与今天的孟加拉国相差无几,但是韩国是从低收入经济体迈入高收入经济体的两个经济体之一(另一个是中国台湾)。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评价每个经济体发展的绩效如何,而在于如何取得绩效。按照新结构经济学范式,韩国之所以取得了如此成功的发展绩效,孟加拉国却数十年都未走出低收入陷阱,原因在于前者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吻合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方法,而后者却远离了新结构经济学之路。中国的发展轨迹介入二者之间,改革开放之前远离了新结构经济学之路,而之后大致遵循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

总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独特性便在于基于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现实约束条件分析与提炼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过程与方法。如果未能认识到发达国家主流理论以发达国家作为标杆的研究范式在发展中国家运用必然存在的局限性,照搬这些理论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结果经常会事与愿违,以此为参照系来观察社会则经常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变为社会批评家而难于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甚至还会出现好心干坏事的后果。



资料来源:《全球竞争力报告 2011-2012》,p.9。.

图 1.5 以发达国家参照系:要素/结果导向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结构转型报告》(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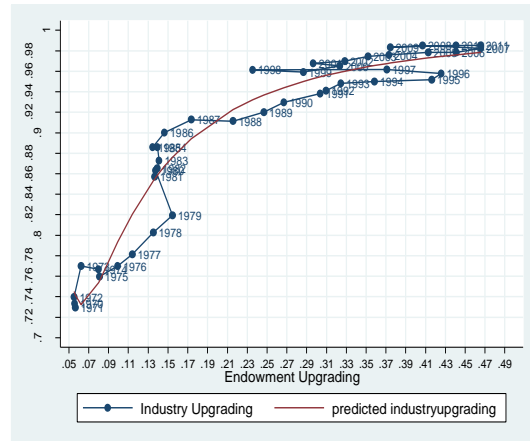
图 1.6 从发展中国家自身出发:方法/过程导向

²⁸ 另一作者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大家罗伯特·巴罗。

²⁹ 萨拉-伊-马丁(Sala-i-Martin)等利用古典估计的贝叶斯平均(BACE)方法对含有 67 个变量集合的跨国横截面回归基准估值(Barro and Sala-i-Martin, 2004)。这恰恰是前述阿德尔曼讽刺的发展经济学 X 理论范式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的体现。不幸的是,国内汗牛充栋的竞争力或发展报告蓝皮书均采取此套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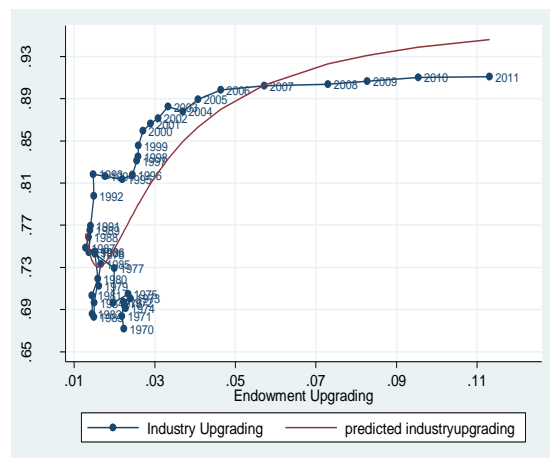
要素/结果：韩国 2011-2012 年的竞争力（24/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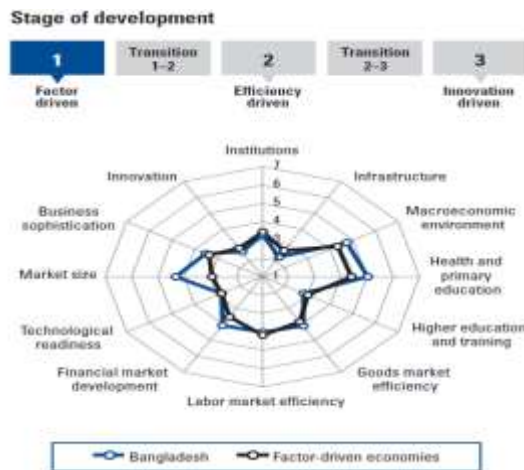
方法/过程：韩国的结构升级路径：1970-201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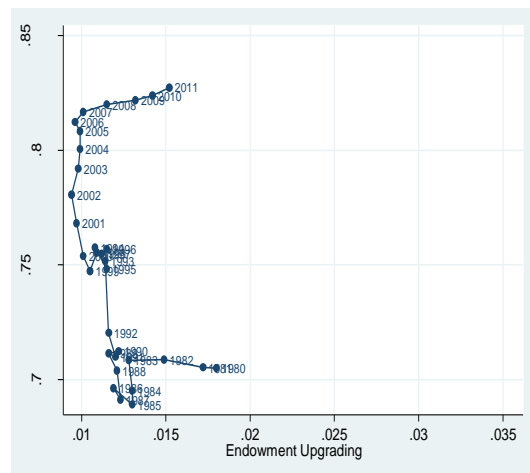
要素/结果：中国 2011-2012 年的竞争力（26/142）



方法/过程：中国的结构升级路径：1970-2011 年



要素/结果：孟加拉国 2011-2012 年的竞争力（108/142）方法/过程：孟加拉国结构升级路径：1980-2011 年



注释：右边结构升级路径的横轴是以实际人均 GDP 度量的禀赋结构，纵轴是以非农产值占 GDP 的比重度量的生产结构（当然，生产结构还有其他重要的维度，不在此展示），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报告(WDI, 2014)。资料来源：左边的竞争力排名资料来自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1-2012)，右边的升级路径来自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内部手稿《世界经济结构转型报告》(2014)。

图 1.7 发展要素/结果与发展方法/过程之间的比较：以韩国、中国、孟加拉国为例

第3节 新结构经济学体系：结构的科学

3.1 新结构经济学体系如何构建

基于前述研究取向和研究范式，新结构经济学在具体实践层面上主张应该从发展中国家现在有什么（即其要素禀赋）出发，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即其比较优势），并规划把现在能做好的做大做强，以实现逐步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目标。在对应的理论层面上，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是结构变迁的价格理论，包括以禀赋结构的供给与需求为主要内容的静态和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形成了以禀赋结构升级和生产结构升级作为发展过程，以企业自生能力作为微观基础，以相对价格作为分析的手段，以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作为发展方法，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为政策导向的一套关于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分析框架。

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议题几乎囊括了经济发展与转型的所有核心议题，³⁰涉及到了大部分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的研究领域，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由于研究视角、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的不同，在这些议题和领域的研究结论和政策主张也有所不同。因此，按研究议题和领域划分，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学科可分为新结构经济学原理、新结构产业经济学、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新结构金融学、新结构区域经济学、新结构国际经济学、新结构宏观经济学、新结构转型经济学、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新结构国际发展学、新结构环境经济学以及其他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方向等子领域。³¹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原理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与各个子领域形成了逻辑上一以贯之的从一般到具体的统一学科体系。

在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思想的基础上，林毅夫将新结构经济学概括为“关于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分析框架”，显然其学科的两大基石是“结构”与“新古典”。³²“结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新结构经

³⁰ 对于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姚洋（2012，第4页）指出，主要的不同是，发展经济学注重对结构性因素的研究，而增长经济学研究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增长经济学多将一国乃至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发展是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所引发的，这包括人口结构的变化、非农化、城市化、产业升级以及制度变化等等，这些变化使得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区分尽管不完整，但确实指出了“结构”对发展的重要性。

³¹ 新结构经济学尽管被称之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但是其学科范畴超出了传统狭义的发展经济学领域。得益于战后第一波结构主义发展思潮，发展经济学得以以独立的学科著称于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新兴国家刚独立的政府寻求关于加速其发展的建议，发展的课题被摆到了经济学家的面前。亚洲和非洲的新政府，可以从白宫获得政治独立，但为了经济独立则要求助于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然而，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必须被重新发现或予以重建。尽管古典经济学家关心经济增长和‘进步状态’，但兴趣由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而终止。在现代发展经济学发端之际，阿瑟·刘易斯推出了他的《经济增长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1955）。他说，‘这一类书是必要的，因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再一次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兴趣，因为全面论述这一课题的著作已经有大约一个世纪没有问世了。最后一部涉及这一广泛领域的伟大著作是约翰穆·S·勒发表于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950年，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大学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1950年，拉·明特在牛津大学举办了第一次关于发展问题的研讨会；1952-1953年，发展经济学被引进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大批刊物致力于刊登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据 *Index of Economic Articles* 所载，发展问题文章的数目在从1950-1954年到1960-1964年的10年间增加了三倍。”（杰拉尔德·迈耶，2004年，第9页）。

³² “新”与“旧”结构经济学的相同之处是，二者的理论基础都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结构的差异。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其对结构刚性根源的看法不同：旧结构经济学认为，存在一些市场失灵，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市场失灵是由结构刚性外生决定的，而这些结构刚性的存在，又是源于垄断的存在、劳动力对价格信号的反常反应和/或要素的不可流动性。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若想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这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来说，资本的稀缺、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落后，都使得资源从已有产业向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重新配置无利可图（林毅夫，2014，第22页）。与旧结构主义经济学不同，正是秉承理性人的“本体”，新结构经济学才称之为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但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各个分支忽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结构的差异”不同，新结构

经济学牢牢抓住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要素禀赋和其结构的基础性作用，由其内生出生产结构，进而牵出就业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结构、开放结构、周期结构、环境结构、制度结构等经济社会结构现象；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在任何特定时点是给定的，但随着禀赋积累而不断升级，产业结构以及上述其他结构也随之变化，因此又涉及结构动态调整问题。“新古典”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最基本的新古典方法是关于理性和最大化或最小化的一般性法则，即理性选择。³³任一特定时刻一个经济的总要素禀赋，也就是该经济的总预算约束，与要素禀赋的结构，同家庭的偏好和企业的生产技术，三者共同决定了经济中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总预算约束和相对价格是经济分析的两个最基本的参数。与此同时，任一特定时刻，资源禀赋是给定的，但会随时间变化，这使得资源禀赋及其结构成为经济发展分析的最佳出发点。当然，“结构”的理性选择只是结构变迁价格理论的第一步。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第二步是由“结构”的供给与需求构成的一般均衡理论。如前所述，作为分析的起点或状态变量，在某个状态下禀赋结构的供给是给定的，生产结构的选择产生了对禀赋结构的需求；生产结构的选择也产生了对就业结构（包括人力资本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结构（包括地区与城市化）、开放结构（包括贸易结构与外资结构）、周期结构、环境结构、制度结构的需求，供给与需求的匹配便产生了均衡的相对价格和结构状态。当然，这其中也涉及结构扭曲以及消除扭曲的方法。第三步则是作为状态变量的禀赋结构发生动态变化之后，其他结构安排随之变迁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总之，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经济结构的科学，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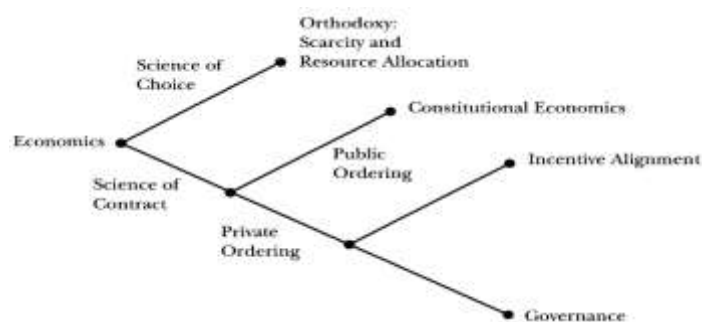


图 1.8 主流的“选择的科学”和跻身主流的“缔约的科学”：对“结构的科学”的忽视

资料来源：Williamson(2002)。

经济学用新古典理性主义系统分析了“经济结构”。第二波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虽不算是对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的总结，但的确可以视为‘发展经济学’终结的标志（张军，2013）。”与旧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忽视理性人对激励做出反应的结构刚性假设不同，第二波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则以理性人对激励做出反应作为一般原则抹杀了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如图 1.8 所示。克鲁格(Krueger, 1986)就认为：“只要承认个人对激励机制的反应，承认‘市场失灵’的原因是不恰当的激励，而不是对激励的毫无反应，那么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独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复存在了。相反，它变成为一个应用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劳动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公共财政其他领域的工具和观点，都可以用来解决发展背景下出现的特定问题和政策问题”。新结构经济学同时将旧结构主义主张的“结构”和新古典主义主张的“理性”结合起来，故称之为“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两大科学基石，Rodrik(2011)有很准确的评论：“林毅夫希望让结构主义经济学重回历史舞台，我十分支持他的想法。他希望将结构主义的思想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思维结合起来，我同样支持这一想法。结构主义最中心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与发达国家不同。它们不只是富裕国家的缩小版本。要理解低发展水平的困难，就必须理解就业结构和生产结构是如何决定的，特别传统和现代生产活动下社会边际劳动产出之间的巨大差距，还必须理解如何克服结构转变的障碍。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把这两套思想结合起来，就能够产生一套新的发展经济学，它既不摒弃当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又能够恰当考虑到发展中经济的特定情况”。³³ 整个二十世纪，“选择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Choice)是经济学最主要的内核。正如罗宾逊夫人(Robbins, 1932, p.16)最著名的定义：“Economics is the science which studies human behavior a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ends and scarce means which have alternative uses”。目前经济学最基本的选择理论包括在预算约束和相对价格之下选择消费束最大化效用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和在生产可能性约束与要素成本与产品价格之下选择投入产出组合束最大化利润的企业理论。与将企业视为生产函数黑洞的新古典企业理论不同，新制度经济学将企业视为治理结构，开创了缔约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Contract) (威廉姆森，2002)。类似地，新结构经济学可以称之为“结构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Struc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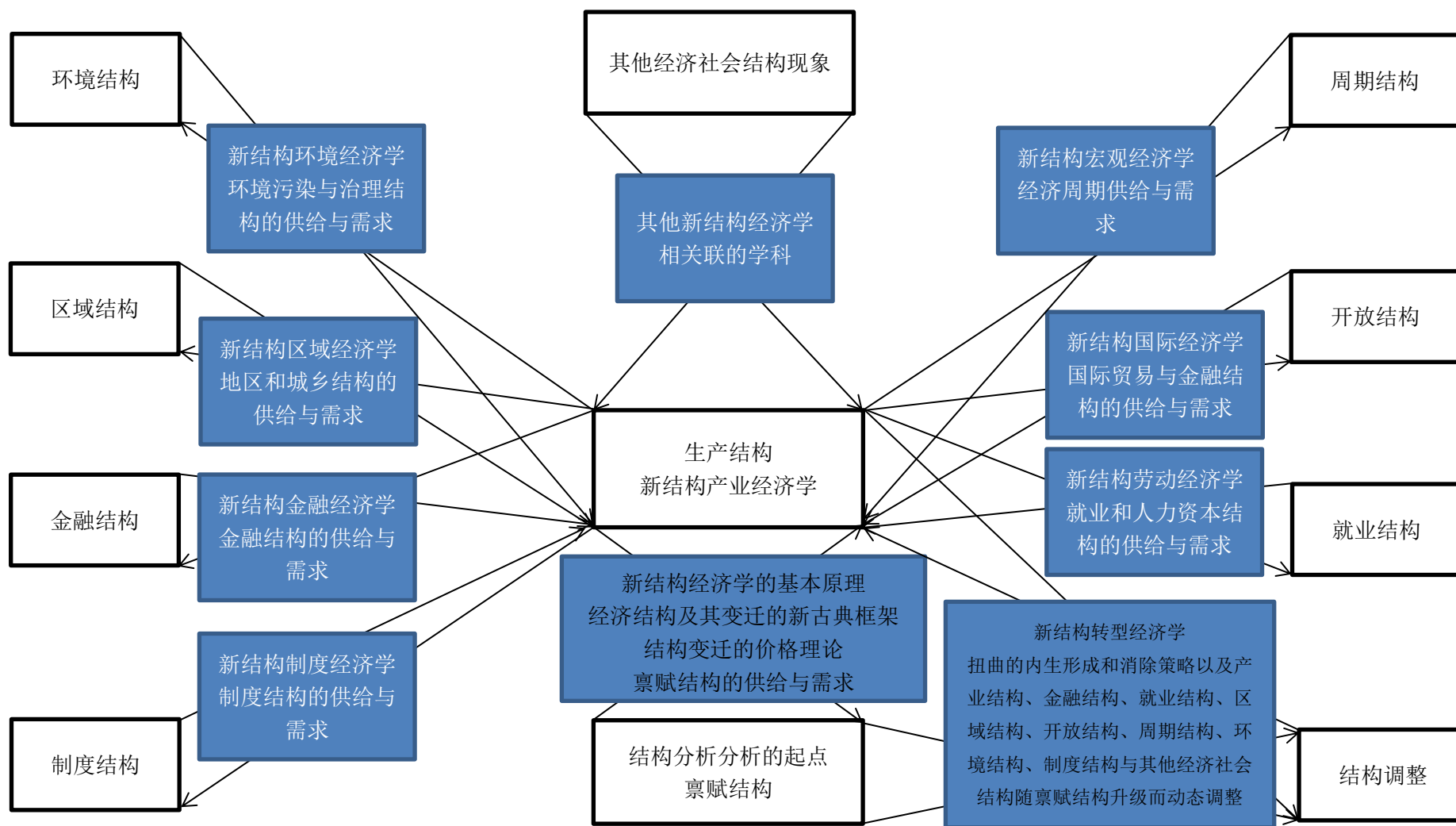


图 1.9 新结构经济学学科架构的内在逻辑体系：结构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Structure)

3.2 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³⁴

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中系统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分析思路、理论逻辑、核心命题与政策主张，基本上勾勒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即关于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这一分析架构，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考虑在内；分析政府与市场在不同发展水平上的作用、以及从一个水平向另一个水平的转换机理；分析经济扭曲出现的原因，以及政府为退出扭曲应该采取的措施。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它在每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那个时点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对于特定的经济体，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结构是给定的，不同时期的要素禀赋及结构又是可变化的。

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就是该经济体在特定时点上的总预算，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对多的要素价格相对便宜，相对少的要素价格相对高昂，所以，一个经济体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它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是不一样的。

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比如，一个经济体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个经济体在这类产业上的要素生产成本就会比劳动力相对短缺、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的经济体的成本低，这样就具有了竞争优势，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实现竞争优势的前提。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所有产业都符合它的比较优势，这样的产业结构是最优的、最有竞争力的结构。

一个经济体只有到了资本非常丰富的阶段，才会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很高的收入水平。所以，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收入水平，中间目标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措施则是加速资本积累。一个低收入经济体只有加快资本积累，才能使资本更快地由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使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也就是说，收入水平的提升依赖于产业结构的提升，而产业结构的提升则依赖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

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不能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不能升级，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就不能提高，就会跌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必须不断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让每个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资本。要快速增加每个劳动者可以使用的资本，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个时点上都发展同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进而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越充分，竞争力越强，投资回报率越高，经济剩余越多，积累意愿越强，要素禀赋结构水平升级就越快。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越快，比较优势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越快，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完善也要越快。借助于这个逻辑，就把发展的本质和它的决定因素论述清楚了。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资本密集度从小到大的所有产业都现存于世界的产业链中的成熟产业和技术可供选择。然而，要实现向资本更密集产业的升级，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升级其要素禀赋结构，而这这就要求资本积累速度高于劳动力增长速度。当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顺着产业阶梯拾级而上时，由于资本设备的不可分性，该国生产的规模效应也在扩大。该国企业的规模更大，需要更大的市场，这些都反过来要求基础设施（比如电力、交通、金融以及其他软件基础设施）的相应变化。

产业升级和产业多样化的过程也增加了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企业离世界科技前沿越近，

³⁴ 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雏形最早出现在 1994 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可参考该书的第 2 章和第 4 章。一个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可参考 Lin, J.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 26(2), p.193-221.或者，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第 1 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增订版本。

就越难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成熟技术，也就越需要自主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从而面对的风险就越大。根据风险的来源，一个企业独有承担的风险可以分为三类：技术创新风险、产品创新风险和管理才能风险。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倾向于使用成熟的技术为成熟的市场生产成熟的产品。此时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来自于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才能。当发展到了更高水平，企业往往发明新技术以向新市场生产新产品。此时除管理才能风险以外，企业还会面临技术和市场成熟的风险。因此，虽然技术创新、才能风险以外产品创新和管理才能都影响到企业的总体风险，但三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却因产业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大不相同。

随着企业规模、市场范围和风险性质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对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和软件）的要求也发生变化。倘若基础设施无法同时改善，各个产业的升级过程都将面临 Leibenstein 讨论过的 X-低效率问题。在任何给定时点，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上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因此，随着资本积累或人口增长，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发生变化，使其产业结构偏离原来发展阶段的最优产业结构。

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都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时，经济将会最有竞争力。随着这些充满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不断成长，它们将占有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份额，同时也将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表现为企业的利润）。而且，由于产业结构在那个要素禀赋结构下是最优的，如果把这些经济剩余重新投资的话，其回报也将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将不断积累实物和人力资本，不断提升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并且使得本国企业在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的产品中越来越有竞争力。

企业关注的是利润。要想使企业自发进入和选择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该经济的价格体系就必须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只有竞争性的市场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无论在哪一个发展水平上，市场都应被作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机制。这种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方法对于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看起来或许是缓慢而令人沮丧的。但事实上，这种办法却是积累资本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最快方法；并且，只要能得到更为发达的国家已经开发出来且依然存在于这些国家的技术，并进入这类产业，其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还可加快。在每一个发展水平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可以选择适合该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技术（并进入相关产业），而不用自己重新研发。

随着发展中国家沿产业和技术阶梯拾级而上，许多其他变化都随之而至：企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复杂，资本需求增加，生产和市场规模也有了变化。远距离市场交易越来越多。因而，为了给新升级的产业中的企业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一个灵活、平稳的产业和技术升级过程就需要教育、金融、法律和硬件基础设施方面同时做出相应改进。显而易见，单个企业无法有效地内部化所有这些变革成本，而多个企业之间为了应对这种挑战进行的自发协调往往也不可能实现。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集体行动，至少需要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与工业企业二者之间协调行动。这样，就把政府拉了进来，政府要么自己进行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要么就需要积极协调各方的行动。

一个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其潜在比较优势也发生变化，哪些新产业符合这一新的比较优势呢？产业升级是由先行企业推动的，先行企业家进入新产业要承担很多风险，如果失败了，说明这个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其他企业不会进入；如果成功了，证明这个产业是该经济体新的比较优势，其他企业就会跟进产生竞争。由于先行企业要承担很大的失败的风险，却很难得到成功时的垄断利润，为了鼓励企业家成为先行者，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激励。同时，先行企业是否成功除了取决于进入的产业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变动所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外，还决定于各种软硬基础设施是否随着产业的升级、资金、市场规模和风险的扩大做出相应的完善，这种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超乎任何单个企业的能力，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也需要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决策来改善软硬基础设施，或利用其可动用的有限资源来提供相应的完善。所以，有为的政府同样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前提。

3.3 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³⁵及其理论贡献³⁶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是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即结构变迁的价格理论，包括以禀赋结构的供给与需求为主要内容的静态和动态一般均衡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原理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内涵旨在揭示经济发展的本质，外延则涉及经济结构的方方面面。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内，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可以概括为禀赋结构(Endowment Structure)和生产结构(Production Structure)相辅相成的升级过程，禀赋结构包括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经验知识等禀赋要素的相对构成，生产结构包括了产业、创业、技术、研发、规模、分工、城市化、全球化等等活动的相对构成。按照常规的总量分析，可用总量生产函数刻画一个经济体的生产结构，禀赋结构可对应于生产函数投入要素的结构。因此，在基本原理层面，新结构经济学对宏观一般均衡理论最核心的贡献在于“从禀赋结构角度内生了总量生产函数”。³⁷

³⁵ 我们将在第四章“新结构经济学原理”详细展开讨论新结构经济学的三条基本原理：结构变迁的一般原理、结构转型的一般原理、政府在结构变迁中作用的一般原理。这些原理主要体现在林毅夫等 1994 年出版并被翻译为十多国文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林毅夫 2007 年的马歇尔讲座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林毅夫 2012 年的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Policy* (World Bank, 2012) 等三部著作中。

³⁶ 相对于目前已经取得的理论进阶而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远不止于是第三波发展思潮，其理论张力也不仅仅限于在现有主流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内生生产函数，具有结构革命的潜力，有望重构绝大部分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的未来展望中对比数学和物理学两门自然哲学基础的学科进展，展望新结构经济学进行结构革命的思路。

³⁷ 简单地讲，所谓的一般均衡理论是指在生产要素的供给函数与消费者的需求函数，以及反映生产技术状况的生产函数为既定条件下，通过生产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以及这两种市场互相之间的供给与需求力量的相互作用，每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给量与需求量将各在某一价格下同时趋于相等，社会经济将达到全面均衡状态，这时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称为均衡价格，相应的供求数量称为均衡供销量。与“从禀赋结构角度内生总量生产函数”这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一脉相承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总量生产函数的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学的绝大部分内容，尤其是增长理论都对总量生产函数的形式都做了非常强的直接设定，那么总量生产函数是如何从微观生产单元的个体生产函数推导而来的呢？在不同发展阶段，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微观生产单元是不同的，例如农业社会微观生产单元主要是传统农户，工业化社会微观生产单元主要是工厂，后工业化服务社会微观生产单位主要是组织形态各异的公司；即便微观生产单元都相同，但是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的不同，微观生产单位之间的结构关系也不同，结构性加总形成的总量生产函数也不同。琼斯(Jones, 2005)从微观生产个体“知识(ideas)”的分布讨论了总量生产函数的形状，如果“知识(ideas)”是帕累托(Pareto)分布，全球生存函数则是科布-道格拉斯(C-D)函数。付才辉(Fu, 2015)假定微观个体为具有不同要素密度的 C-D 生产函数分布，通过要素市场的流动性均衡加总出了一个总量生产函数，发现个体之间不同的结构性关系（以要素密集度分布刻画）会得到不同的总量生产函数，即便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范式下，不同结构分布对应的总量生产函数亦会随结构分布的变化有非常不同的结论。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一贡献，鞠建东（2013）认为结构分析并不仅仅局限于发展经济学，所有的经济学里都有结构，对整个经济学都很重要，并给出了三个理由：“（1）以前经济学模型假设很简单，认为个体都是一样的，没有异质性，加在一起也简单，因此个体与宏观没有区别。经过 30 年变化，现在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是有差别的个体组建成的宏观。新结构经济学的贡献是在宏观结构下对更宏观的变化做更细致的分析，实际上是把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2）所谓结构，就是加总问题。个体加起来，就变成宏观，把宏观解析开来，就变成个体。但中间的个体是随机性碰撞，还是有某种结构？如果我们认为是随机的碰撞，就没有结构，如果不是随机碰撞，就有结构，那么随着经济发展，这种结构是不是变化？（3）既然结构问题回避不了，到底是用市场来调解，还是用政府来调解。就是说，产业结构不断变化，社会结构不断转型的过程中，市场会不会失灵。在理论和实际过程中，市场是会失灵的，因此政府的作用必须加进去。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市场两者不可或缺。如果推向极端来看，无非是只有政府没有市场，或是只有市场没有政府，无非是靠得更左一点，或靠得更右一点。比如说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大家都知道要调结构，但怎么也调不好。因为从美国整个社会来讲，对政府干预市场和产业结构调整，本身有一种抵抗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论上不外乎三个方向，一个是完全的市场，一个是完全的政府，还有一个是政府和市场相互作用。回顾历史，很多没有受过西方经济学训练的人，对整个经济的直觉有时候非常好。比如陈云，很早就提出来有计划的市场。日本虽然没有理论，但上世纪 60、70 年代有过很多产业政策。所以市场既有好市场，也有坏市场，政府也是，无非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如何做取舍。”

禀赋结构供给与需求的静态一般均衡模型的核心是禀赋结构的供给与需求决定的均衡的禀赋相对价格和均衡生产结构,以及影响禀赋结构供给和需求的外生因素对均衡相对价格和生产结构的比较静态效应。在发展的任意阶段,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以及软硬基础设施的相对构成决定了禀赋结构的供给: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相对劳动力更加稀缺,禀赋结构(资本劳动比)的供给水平较低;到了发展的后期,资本相对劳动力更加丰裕,禀赋结构(资本劳动比)的供给水平较高。生产活动的选择决定了禀赋结构(资本劳动比)的需求:选择资本相对劳动更加密集的生产结构,禀赋结构(资本劳动比)的需求水平较高;选择劳动相对资本更加密集的生产结构,禀赋结构(资本劳动比)的需求水平较低。在竞争性市场上,禀赋结构的供给与需求决定了均衡的禀赋相对价格和生产结构(均衡的资本相对劳动密集度)。

作为状态变量,禀赋结构在给定时点上是不变的,但会随时间而变化,新结构经济学也包括在静态一般均衡框架基础上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即禀赋结构升级和生产结构升级的动态一般均衡。禀赋结构升级和生产结构升级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核心机制在于禀赋结构升级(资本劳动比的增加)会导致生产结构升级(资本相对劳动更加密集),反过来,生产结构升级又会导致禀赋结构升级(如果假定储蓄率内生的话,生产结构升级还会影响居民的储蓄倾向)。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动力便是禀赋结构升级与生产结构升级相互相成的循环积累因果效应。³⁸

在任意发展阶段的结构变迁静态一般均衡框架中,给定的禀赋结构在竞争性市场上内生了一般均衡的生产结构与相对价格,也即新结构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如果竞争性市场遭到了破坏或不恰当的干预,生产结构的选择违背了比较优势(如赶超战略),必然破坏相对价格机制,导致微观企业缺乏“自生能力”(Viability);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然需要外部尤其来自政府的保护才能生存,这不但不能促进禀赋结构升级,反而蚕食了禀赋结构。在结构变迁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中,禀赋结构升级受到阻碍就无法促进生产结构升级,生产结构升级不能够升级,劳动生产率也不能够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就得不到改善,进一步无法促进禀赋结构升级,从而经济发展便进入了恶性循环。这便是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有效市场”(Efficient Market)政策取向的理论依据。不同于经济前沿的发达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处于前沿内部,生产结构升级存在后发优势(Late-Mover Advantage)。但是由于禀赋结构由于软硬基础实施外部性的存在,以及生产结构升级过程中存在的协调与激励问题,需要恰当的结构变迁政策促进禀赋结构升级和生产结构升级。这便是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有为政府”(Facilitation Government)的理论依据。如果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任何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均可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脱贫致富,这便是亚洲四小龙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成功经验的理论精华。

³⁸ 循环积累因果效应其实也可以追述到亚当·斯密那里,“分工程度决定市场范围,市场范围反过来又决定分工程度”的杨格定理便是其经典的描述(Young, Ally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Economic Journal*, 38, 1928, p. 527-542)。后续的研究,尤其是内生增长理论大多用规模报酬递增概念,但忽略了背后结构变迁循环积累因果关系,单单强调知识或思想的外溢性。例外的是,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达尔进一步阐述了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循环积累因果原理是指从一个动态的社会来看,社会经济各有关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积累的因果关系。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这后一因素的变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前一因素的变化,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那个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积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1952)便以杨格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为开篇展开讨论。《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1957)一书中提出了“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概念具体说明了发展过程的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扩散效应是指一国(地区)的某一地区由于某种原因而创办了许多工业,逐渐形成了一个经济中心,然后向周围地区扩散,因而带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这些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中心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上升的循环累积过程。回波效应是指某一地区的经济中心的形成和发展,由于种种原因会引起其他地区经济的衰落。例如,人才、资金、技术纷纷从落后地区被吸收到经济发展地区,从而使发达地区的经济更加发达,而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越来越不发达,这就产生了一个下降的循环累积过程。

在基于禀赋结构、比较优势、自生能力、后发优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等核心概念建立起来的一套关于发展与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原理将建立更加形式化的结构变迁的一般均衡理论,甚至能够丰富更加一般化的宏观一般均衡理论。³⁹

第 4 节 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子领域概述⁴⁰

4.1 新结构产业经济学⁴¹

产业经济学以“产业”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发展、产业布局 and 产业政策等,属于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现有的理论包括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产业关联理论、产业布局理论、产业发展理论以及产业政策研究等等。与产

³⁹ 简单地讲,所谓的一般均衡理论是指在生产要素的供给函数与消费者的需求函数,以及反映生产技术状况的生产函数为既定条件下,通过生产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以及这两种市场互相之间的供给与需求力量的相互作用,每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给量与需求量将各在某一价格下同时趋于相等,社会经济将达到全面均衡状态,这时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称为均衡价格,相应的供求数量称为均衡供销量。新结构经济学对宏观一般均衡理论的拓展有两个核心的基本问题:总量生产函数的微观基础与内生可变总量生产函数。对于第一个问题,宏观经济学的绝大部分内容,尤其是增长理论都对总量生产函数的形式都做了非常强的直接设定,那么总量生产函数是如何从微观生产单元的个体生产函数推导而来的呢?在不同发展阶段,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微观生产单元是不同的,例如农业社会微观生产单元主要是传统农户,工业化社会微观生产单元主要是工厂,后工业化服务社会微观生产单位主要是组织形态各异的公司;即便微观生产单元都相同,但是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的不同,微观生产单位之间的结构关系也不同,结构性加总形成的总量生产函数也不同。Jones 从微观生产个体 ideas 的分布讨论了总量生产函数的形状,如果 ideas 是 Pareto 分布,全球生存函数则是 C-D 函数(Jones, I. Charles, “The Shape of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the Direction of Technical Chang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p.517–549)。付才辉假定微观个体为具有不同要素密度的 C-D 生产函数分布,通过要素市场的流动性均衡加总出了一个总量生产函数,发现个体之间不同的结构性关系(以要素密集度分布刻画)会得到不同的总量生产函数,即便在传统的增长理论范式下,不同的总量生产函数亦会有不同的结论(付才辉, “Decoding the Structure behi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I”, 2015, *NES Working Paper*, 2015)。对于第二个问题,尽管对(总量)生产函数有各种各样形式的设定,诸如里昂惕夫生产函数、C-D 生产函数、CES 生产函数等等,但生产函数本身却是外生给定不变的。这一问题涉及传统增长理论赖以生存的卡尔多特征事实。具体内容参见第三章。大量文献从收入分配角度质疑了劳动和资本报酬份额几乎恒定这一早期卡尔多特征事实,并指出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主流宏观增长模型的可靠性。一些研究讨论了劳动份额在中长期内的可变性,比如西欧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现的大幅下降。在 1960-1997 年间,穷国的劳动份额出现了下滑,而富裕国家则出现了上升趋势。1971-2011 年间劳动份额出现全球下滑的趋势(Karabarbounis Loukas and Neiman Brent,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61–103)。按照约定俗成的定义,生产函数是有效的关于投入和产出的生产计划,其中的“有效”指的是没有用同样的投入生产出更多的产出或用更少的投入生产出相同产出的方法。新结构经济学对一般均衡理论最大贡献的切入点可能就在这里: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可能导致投入产出关系的变化,即从禀赋结构角度内生了表征生产结构的生产函数。付才辉和林毅夫基于可变与不变总量生产函数的设定,以及对比新古典索罗模型与新结构经济学的动态机制及其稳态结果,利用 PWT8.0 的 167 个经济体 1950-2011 年收入、资本存量、就业与劳动份额数据重新进行的核算发现,新结构经济学中禀赋结构与生产结构相互相成的结构变迁是发展中经济体增长与收入最主要的来源,而新古典索罗标准核算严重高估了技术进步而低估了结构变迁的贡献。相对于可变总量生产函数核算,不变总量生产函数核算的禀赋驱动增长率平均被低估了 125.53%,去掉大于 0.5 或小于-0.5 的异常值之后也被低估了 65.99%;技术进步率平均被高估了 113.14%,去掉大于 0.5 或小于-0.5 的异常值之后也被高估 74.57%。在稳态的对数人均收入水平核算中,相对于新结构经济学而言,新古典索罗模型的禀赋结构(资本深化)的贡献份额平均被低估了 113.17%,去掉大于 150 或小于-50 的异常值之后也被低估了 132.43%;技术水平的贡献份额被高估了 121.56%,去掉大于 150 或小于-50 的异常值之后也被高估了 119.04%。上述核算结果显著地支持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论断与主流理论的不足(付才辉和林毅夫,《结构变迁的价格理论:禀赋结构的供给与需求》, 2015 年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联谊会(YES)会议论文,厦门大学 WISE)。具体内容参见第五章“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核算与发展核算”。

⁴⁰ 林毅夫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对各个子领域的问题做了简要讨论(林毅夫, 2014, 第 1 章, 第 23-31 页),这一节在此基础上根据图 5 的逻辑架构进一步展开。

⁴¹ 本节为第六章的简要概述。

业结构变迁相关的增长理论在文献中称之为非平衡增长理论。第一类非平衡增长理论是消费需求面驱动的结构变迁,强调收入效应在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主导作用,或可称之为产业结构变迁的恩格尔法则。第二类非平衡增长理论是产业供给面驱动的结构变迁,强调各部门之间的技术进步差异引发的价格替代效应对生产要素跨部门转移的关键性作用,或可称之为产业结构变迁的鲍莫尔法则。⁴²新结构产业经济学主要是从禀赋结构角度研究发展中经济体产业结构的内生机制及其升级的动力机制,进而研究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或可称之为产业结构变迁的林毅夫法则。

新结构产业经济学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有非常基础性的地位,不但直接佐证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原理,而且也是其他领域的重要基础。前面在新结构经济学一般理论框架中,我们使用生产结构而不是产业结构主要是指概括总量经济的生产函数,在图5的逻辑框架中二者可以互换,只不过产业结构是具体多部门的。产业结构之所以在新结构经济学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只要是其直接前承对禀赋结构的需求,直接后续对就业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结构、开放结构、周期结构、环境结构等等结构安排的需求,这些最优的结构安排供给需要与之匹配。具体来讲,新结构产业经济学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禀赋结构驱动的产业结构变迁规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微观企业自生能力基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有效市场基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产业政策原则这四个方面构成了新结构产业经济学E-V-M-G范式(Endowment-Viability-Market-Government)。这与经典新古典竞争理论以及产业经济学SCP分析范式(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结构-行为-绩效)⁴³和产业组织理论的企业竞争行为与市场结构博弈分析范式不同⁴⁴。⁴⁵

禀赋结构驱动的产业结构变迁规律是新结构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经验层面上,克拉克定律或库茨涅茨特征事实描述了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农业比重逐渐下降,工业比重逐渐增加,然后是工业比重逐渐下降,服务业比重逐渐增加。但更能够反映产业结构随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变化而变化的经验特征事实是雁阵模式。⁴⁶雁阵模式除了能够更加细分产业地刻画产业结构变迁特征之外,还能够刻画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新近,产业结构变迁的雁阵模式在新结构经济学文献中得到了理论化:随着一国的资本禀赋变得更加充足,该国的产业将会内生地升级到资本更密集的产业。该模型描绘了一个连续的倒V形产业演化路径:当资本积累到一个特定点的时候,一个新的产业产生、繁荣、然后衰落,最终消失。当该产业衰落的时候,一个资本更密集的产业将会出现并蓬勃发展(鞠建东(Ju)、林毅夫(Lin)和王勇(Wang), 2015)。⁴⁷

⁴² 可参见新近何瑞仁多夫(Herrendorf)等(2013)的相关综述。

⁴³ SCP范式是由美国哈佛大学产业经济学权威贝恩(Bain)、谢勒(Scherer)等人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基本涵义是,市场结构决定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而企业行为又决定企业在各个方面的经济绩效。

⁴⁴ 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是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铁罗的《产业组织理论》(可参见中文版,张维迎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⁴⁵ 偏离标准产业竞争理论的还有“缔约的科学”和奥地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新古典竞争理论所假定的理想状态(完全竞争)的偏离可能恰好是效率的需要,比如垄断可能是保障专用性投资的一种有效率的安排(威廉姆森,1975)。在熊彼特看来,新古典竞争理论所言的无效率的垄断恰恰是有效竞争的结果,其为创造性破坏提供了保障(关于新古典竞争理论与奥地利竞争理论的评述,可参见林民书和付才辉(2012))。然而,竞争对增长影响的实证结论是不明确的,可参见阿洪和赫瓦特(2009,第12章)的综述。

⁴⁶ 赤松要(Akamatsu)在1932年就发表了一篇具有开创价值的论文,但直到1960年代才翻译成英文,其中讨论了他首次提出的“雁行模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含义是“大雁组成一个倒V字形阵形向前飞”。哈古赤(Haraguchi)和若宗家(Rezonja)(2009)利用1963-2006年148个小国18个制造业的数据也发现了的雁行模式。

⁴⁷ 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资本是流动的,但是这种资本的流动性不会使高收入的、资本充足的国家的资本劳动比和低收入的、资本缺乏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相等。这是因为资本从高收入国家流向低收入国家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利用低收入国家劳动力(或自然资源)充足的比较优势,把其当作出口基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产业应该与低收入的接受国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尽管外商投资企业采用的技术可能比本国企业资本更密集。第二个目的是获得进入低收入国家市场的通道。就这种类型的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企业的自生能力(Viability)是新结构产业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企业自生能力是决定产业能否顺利转型升级的前提。现有关于产业结构变迁内在机制的理论研究都隐含假设“经济中所有企业都是有自生能力的”。但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当企业选择进入到与该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一致的产业时,即使该企业有良好的经营管理,也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从而不具备自生能力,必须依赖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才能得以继续经营下去(林毅夫, 2003)。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前提条件是选择进入企业有潜力具备自生能力的产业部门或者产业区段。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不够产生剩余、积累禀赋,反而通过外部的资源转移蚕食了禀赋,阻碍了禀赋结构升级,进而妨碍产业结构升级。

新结构产业经济学强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有效市场基础。有效的市场机制在促进产业结构顺利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开放、充分竞争的市场在为禀赋要素提供正确的价格信号和为市场主体提供合适的激励约束以促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为了使得企业能够按照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业和技术,要素相对价格就必须能够反映经济体中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而这样的要素相对价格也只有在竞争性市场体系中才能存在。

新结构产业经济学也强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产业政策。⁴⁸由于政府可动用的资源有限,每个新的产业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不是完全一样,政府在无力为所有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以产业政策来为先行者提供必要的激励,并为这些产业提供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应该是一个有用的工具。绝大多数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原因在于根据结构主义所制定的产业政策试图去发展超越发展阶段、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于是在 80 年代以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主流经济学界形成了反对政府采用产业政策的共识。然而,政府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即使建立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家仍有可能没有成为先行者的积极性,或是,即使有了先行者,也会因为缺乏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而失败。例如智利,市场化的改革很彻底,但是 30 年没有任何新产业涌现,原有的产业则因其他更具有竞争力国家的出现而不断消失,出现去工业化的现象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少数发展成功的国家的政府都发挥了有为的作用,以产业政策来协助企业进入新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⁴⁹,因势利导产业的升级。所以,不宜以绝大多数国家政府过去的产业政策的失败为理由否定政府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有为作用的必要性。

产业政策无作为,或者产业政策作为失败除了违背比较优势的根本原因之外,缺乏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设计原则和分类实施方式也是重要的因素。⁵⁰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产业政策设计原则,包括市场失灵原则——产业政策只出现在市场失灵的地方;自生能力原则——产业政策要符合禀赋结构的潜在比较优势;成本收益原则——产业政策只提供有限

资本流动而言,外商投资的产业要比当地企业的资本更密集,但仅有那些与接受国的比较优势一致的生产活动会被安排在该国,比如把零件组装成最终产品。因此,即使资本具有流动性,由“一个国家在任一给定时间点的相对资本丰裕度是给定的”这一假设得来的理论观点依然是成立的(鞠建东(Ju)、林毅夫(Lin)和王勇(Wang), 2015)。

⁴⁸ 可参考林毅夫和张夏准(Chang) (2009) 之间的讨论以及斯蒂格利茨和林毅夫等主编的《产业政策革命》(卷 I、II)。需要说明的是,也只有完全竞争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才不需要政府积极的产业政策,许多理论流派都有自己的产业政策主张,只是各自的理论依据和产业政策方式有所不同。例如阿洪和赫瓦特(2006)的熊彼特讲座便总结了熊彼特创新增长理论视角下的产业政策。豪斯曼(Hausman)和克林各尔(Klinger) (2007) 则总结了产品空间理论视角下的产业政策。

⁴⁹ 潜在比较优势是指一个产业从要素生产成本来讲已处于国际的低端,但是,因为缺乏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交易成本太高,总成本在国际上还处于高位,而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⁵⁰ 大体上讲,学界对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其实并没有多大异议,争论的焦点往往是产业政策的可实施性。过去数十年中,对于以特定部门为目标的政策受到普遍的怀疑,其原因是这种政策允许政府以一种随意的方式挑选赢家(pick winners)。但是,如果可以利用市场信息以及关于外部性规模的信息来制定恰当的部门专用政策,可能会减少这种争议,也确实可能大大提升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克雷默(Kremer, 1998)借鉴了机制设计的思想使用模拟市场拍卖机制来确定目标产业的 R&D 补贴数额,便是这方面的尝试。

的激励而非长期的保护；动态调整原则——产业政策要匹配产业转型升级的动态过程⁵¹；长期目标原则——产业政策不应沦为短期宏观调控的工具；透明问责原则——产业政策不应沦为设租和寻租的温床；有限倾斜原则——产业政策不应过度倾斜以避免结构失衡⁵²；自我发现原则——产业政策应多方论证避免闭门造车以发现发展机会；萝卜大棒原则——产业政策的受益者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林毅夫、付才辉和刘培林，2015）。⁵³鉴于一个国家产业发展的异质性，林毅夫（2014）也提出了不同的产业政策分类与实施方式：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政策，适用于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从而具备较大后发优势和升级空间的产业。这类产业中，可利用“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GIFF）的框架来制定产业政策。⁵⁴第二类是领先型产业政策，适用于发展水平已经和发达国家的产业差距很小，甚至已领先于世界产业前沿水平的产业。这类产业中，应该用和发达国家同样的方法来支持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所需的基础科研。第三类是退出型产业政策，适用于已经逐步失去比较优势的夕阳产业。⁵⁵这类产业中的产业政策应该帮助企业将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或国家，以及帮助有条件的企业走向微笑曲线两端。第四类是“弯道超车型”产业政策。适用产业一般是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的新兴产业。第五类是国防安全型战略型产业政策。这类产业的资本非常密集，研发周期长，但为国家安全所必须，不能依靠国外，必须自己生产。

4.2 新结构劳动经济学⁵⁶

劳动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以劳动力市场现象及其所引起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主要涉及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理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人力资源经济活动分析、劳动关系与劳动法等劳动制度与人力资本政策。新结构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结构变迁过程中适宜的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

关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旧结构经济学言之甚少。与之相反，新古典经济学表明，许多国家在 19 到 20 世纪人均收入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因为这种进步提高了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生产率。而内生增长理论则进一步阐明，增长是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结果。⁵⁷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资源禀赋的组成部分。对经济个体而言，在与经济发展相伴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过程中，风险和不确定性将增加。当各个企业沿着产业阶梯攀登至新的、资本更密集的产业并越来越接近世界产业前沿的时候，它们面临的风险水平也更高。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劳动者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但其形成则需要很长时间。⁵⁸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若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⁵¹ 付才辉（2015）指出，包括中国光伏产业在内的许多工业行业的产业政策未能及时动态调整是导致过度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⁵² 付才辉（2014）在政府公共服务内生增长多部门模型中证明了政府过度的政策倾斜会导致部门之间的结构失衡。

⁵³ 罗德里克（2004）也总结了一些重要的产业政策设计原则。

⁵⁴ GIFF 最早由林毅夫和蒙加（Mogna）提出，可参考《新结构经济学》第 3 章“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政府在结构变迁动态机制中的作用”以及学界的评论和第 4 章“GIFF 的应用——尼日利亚的案例”。

⁵⁵ 在当前的我国为初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则可能为成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

⁵⁶ 本节为第七章的简要概述。

⁵⁷ 新古典模型的经典代表是曼昆（Mankiw）、罗默（Romer）和韦尔（Weil）（1992），其对索罗模型进行了扩展，将人力资本作为物质资本、劳动力之外的另一种可积累的生产要素，通过抵消物质资本积累的报酬递减效应，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缓解经济向稳态收敛的趋势。AK 模型的经典代表是卢卡斯（Lucas，1988），其受到人力资本之父贝克尔的影响，并扩展了宇泽弘文模型（又称为宇泽弘文-卢卡斯模型），其设定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与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成比例，这可以导致正的长期增长率，无论在稳态的转移路径上（曼昆模型）还是在稳态中，增长率都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不是人力资本存量。

⁵⁸ 与新古典模型和 AK 模型中的人力资本理论不同，适宜性人力资本思想与新结构经济学比较一致。适宜性人力资本思想可以回溯到格申克龙那里，据此尼尔森（Nelson）和菲尔普斯（Phelps）（1966）认为人力资本存量

在以后可能就没有能力弥补这一损失。在一个动态增长的经济中,新产业、新技术要求新的劳动技能,因此提前做好规划并进行相应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人力资本的提升必须与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产业升级保持齐头并进。⁵⁹否则,人力资本要么因为投资不足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紧约束,要么则因为教育培训投资过快使一批高学历的劳动者无法找到相应的工作,只能到高收入国家工作而出现脑力外流或留在国内而造就沮丧的年轻一代。因此,不同的产业结构阶段所需的人力资本结构也是不同的,初等教育更有利于远离前沿距离的国家,而高等教育更有利于接近前沿距离的国家。因此,最优人力资本供给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而提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供需结构匹配与否,而非过往文献述及的“人力资本存量或积累”以及“人力资本质量”问题(林志帆,2015)。所以,一套精心设计的人力资本开发政策应该是一个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结构经济学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教育的传统观点,认为发展战略需要包含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以促进产业升级,并使经济体充分利用所有资源。

除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人力资本结构问题之外,就业和收入分配也是新结构劳动经济学的核心议题。⁶⁰要实现收入(效率)和分配(公平)的统一是人类一个古老的挑战。人类历史上大致有四种模式:库茨涅茨倒U曲线(“Kuznets Curve”)、专制灾难(“Autocratic Disaster”)、东亚奇迹(“East Asian Miracle”)、两难取舍(“Trade-Off”) (阿西莫格鲁(Acemoglu)和罗宾逊(Robinson) (2002))。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亚洲四小龙之所以创造了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也得到改善的奇迹,是因为其发展战略遵循比较优势,充分利用了劳动力丰富的禀赋特征,给低收入群体创造了充分就业和分享发展的机遇,并利用了后发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是使低收入的“穷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富人”,以缩小贫富差距。穷人赖以获取收入的手段只有其自身劳动力;而富人获取收入的手段主要是资本。所以,要使穷人收入增长速度比富人快,就应该使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充分就业,并使工资增长速度高于资本报酬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特点是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所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只有选择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或资本相对密集产业中劳动相对密集区段,才能够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充分就业。此外,经济以最快速度增长,整个经济剩余也以最快速度积累,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丰富程度以最快速度提升。劳动相对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后,才能使工资率相对

影响一个国家赶超更大发达国家的能力。本哈比(Benh Habib)和斯皮格尔(Spiegel)(2005)扩展了这一方法,其中人力资本不仅使得适应更高级的技术变得容易,而且还是得在前沿处的创新变得更加容易。然后他们利用跨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增长与人力资本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预言。但是,克鲁尔(Krueger)和林达尔(Lindahl) (2001)则发现,如果将回归局限于 OECD 国家,则增长与人力资本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的显著性就消失了,这意味着教育只对赶超是重要的而对前沿创新不重要。这就是人力资本与增长不相关的克鲁尔和林达尔难题。新近文献破解这一难题的有两条思路:强调人力资本质量和人力资本结构。哈努斯科(Hanushek)和沃斯曼(Woessmann) (2007)认为,对于增长而言,花费于教育的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的质量,他们利用考试分数作为教育质量的一种总度量,发现 1960-2000 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与教育的平均质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延续曼昆、罗默和韦尔的框架,马努厄莉(Manuelli)和瑟萨迪瑞(Seshadri) (2014)的实证也发现,考虑到人力资本质量,人力资本对跨国收入差距的重要性大于 TFP。与强调人力资本质量的思路不同,强调人力资本结构与发展阶段的适宜性更直接地破解了克鲁尔和林达尔难题,是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方面重要的经验证据。阿洪与范登布斯克(Vandenbussche)等 (2006)论证了“距离依赖”的适宜性教育观点:初等或中等教育倾向于产生模仿者,而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更倾向于产生创新者,适宜的人力资本构成对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他们分别用美国各州和 OECD 的面板数据验证该假说。阿西莫格鲁和热利博体(Zilibotti) (2001)也认为发展中国家采纳了大量与其人力资本不匹配的来自发达国家的技能型技术是跨国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⁵⁹ 基于该思路,付才辉(2014)分析了分布在嵌入产业结构分工链条上工作岗位中的农民、农民工、永久性城乡移民、城市蓝领工人与城市白领工人的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匹配问题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乘法结构效应。

⁶⁰ 可参考《新结构经济学文集》中的“新结构经济学与收入分配”部分收录的多篇论文,(林毅夫等(2012),《新结构经济学文集》,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373-456 页)。

于资本的报酬率提高。所以，遵循比较优势的结构变迁方式，能够有效地缩小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此外，在遵循比较优势的结构变迁方式下，政府无需扭曲生产要素市场来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还有能力通过二次分配解决由于其他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如果在结构变迁中违背发展中国家禀赋结构特征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有限的投资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大量的只能凭借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人，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就业市场，从而滞留在现代经济体系之外，成为无法分享经济发展果实的穷人。与此同时，也不利于资本快速积累，从而不利于改变劳动相对于资本的稀缺程度，也就制约着工资率相对于资本报酬率的增长速度。同时，优先发展的产业需要巨额资金。能够投资到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人，不是富人就是和政府关系好、能够利用政商关系从银行取得巨额贷款的人。但优先发展的企业所在的产业既然不符合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没有自生能力，就只有靠国家保护补贴才能生存。而国家保护、补贴企业的资金，自然不会来自这些富人或是具有良好政商关系的人自身，而只能通过价格体系扭曲和集中的金融体系直接或间接地从其它收入较低的人中取得，这实际上就发生了穷人倒补贴富人的倒挂机制，进一步恶化收入不平等问题。

总之，与新古典模型和 AK 模型中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和存量与质量的理论不同，新结构劳动经济学主张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就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的重要性。与主流文献强调的偏好、能力、年龄与初始财富等个体异质性因素和技术进步偏向、全球化、工会等因素不同，新结构劳动经济学强调遵循与禀赋结构相一致的产业结构变迁方式是决定充分就业和改善收入分配的根本性因素（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2008）。⁶¹

4.3 新结构金融学⁶²

金融学的学科分类属于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传统的金融学研究领域大致有两个方向：宏观层面的金融市场运行理论和微观层面的公司金融理论。无论是哪个具体的研究方向，均涉及到一系列金融机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构成的金融系统。新结构金融学主要研究结构变迁过程中最优的金融系统结构与功能。⁶³

人们普遍认为，金融系统的发展对于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但对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具体作用却众说纷纭。人们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之一是缺乏资本积累。从这一点出发，旧结构经济学认为欠发达国家金融部门的问题源自普遍的市场失灵，这些市场失灵无法单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来克服。他们建议政府插手干预这一资本积累过程，动员储蓄，配置信贷，以支持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常常导致金融抑制。吸取这

⁶¹ 付才辉（2014）对比综述了基于经济前沿发达国家经验和基于前沿内部发展中国家经验的收入不平等的文献，发现初始财富、能力、偏好、运气等市场异质性因素是主流文献中强调得最多的因素，与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形成了鲜明反差。

⁶² 本节为第八章的简要概述。亦可参考《新结构经济学》第六章“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增订版本）、《新结构经济学文集》中的“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最优金融结构”部分收录的多篇论文，（林毅夫等，《新结构经济学文集》，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57-642页，2012年）。

⁶³ 从功能角度理解金融系统是金融学的一次重大转变，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C·默顿是金融功能理论的集大成者，其概括了金融系统的六大功能：清算和支付功能，即金融体系提供了便利商品、劳务和资产交易的清算支付手段；融通资金和股权细化功能，即金融体系通过提供各种机制，汇聚资金并导向大规模的无法分割的投资项目；为在时空上实现经济资源转移提供渠道，即金融体系提供了促使经济资源跨时间、地域和产业转移的方法和机制；风险管理功能，即金融体系提供了应付不测和控制风险的手段及途径；信息提供功能，即金融体系通过提供价格信号，帮助协调不同经济部门的非集中化决策；解决激励问题，即金融体系解决了在金融交易双方拥有不对称信息及委托代理行为中的激励问题（兹维·博迪和罗伯特·C·莫顿，2000）。金融系统的功能实际上是金融结构的供给面，不同的金融结构便对应于不同的金融功能组合。

些教训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提倡金融自由化。他们认为，官僚们通常既无激励也无能力有效地干预信贷配置和定价，而界定清晰的产权体系、运作良好的合约制度安排以及竞争会为一个健全的金融系统的出现创造条件。他们建议政府放弃对银行的所有权，并去除对信贷配置和利率的限制。新结构经济学尽管也同意金融压抑的负面效果，却强调如下事实：那些扭曲是人为设计出来的，目的是保护发展中国家优先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新结构经济学还强调，要在转轨过程中同时实现经济稳定和快速增长，对国内金融和对外贸易部门进行自由化时的政策顺序就很重要。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重要的关键的原因在于高效的金融结构必定反映了实体经济的需求。⁶⁴从根本上看，要素禀赋状况决定了产业结构，反过来产业结构又离不开与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金融结构的支撑。具体说来，对一国而言，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特定的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要素价格，要素价格进而决定最优的产业结构、相关风险的性质和企业规模的分布。由于不同行业的企业在规模、风险、融资需要等方面各不相同，实体经济在某一发展阶段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会系统性地有别于该经济体在其他阶段的需求。当产业的技术和产品较为成熟时，风险相对较低，资金回报较稳健，银行是更加有效的融资渠道；而在技术前沿的产业中，创新和研发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都较高，金融市场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金融结构也必将随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迁。当金融结构的特征与该经济体产业结构的特征相适应时，金融体系便能够最大效率地发挥其基本功能，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发展。因此，经济体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存在最优的金融结构。⁶⁵

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要素结构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相对充足的非熟练劳动力(和相对稀缺的资本)，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环节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应该在经济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供模仿，与发展中国家相适应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相对都比较成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规模通常比资本密集型企业小，尤其是在资本规模上。因此，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运转效率高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满足小规模、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的融资需要。标准化财务信息的缺乏导致这些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不高，因此外部投资者关注的重点在于对企业的甄别和对经理层的监督。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银行，尤其是小规模的地方性银行比金融市场更具优势，因为它们更善于处理当地信息，评估与企业商誉相关的“软”信息并与借款者建立长期联系。而且，对低收入国家的企业而言，银行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银行可以带来更低的资本成本：在向为数不多的几家银行借款时，企业无需提供如财务报告、外部审计报告等公开信息，因而节省了宝贵的资金；向银行贷款的利息比在股票市场中支付的股票红利更低，因为贷款的风险更低，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这又节约了一笔资金。因此，如果不存在扭曲，发展中经济体金融结构的主要特征理应是银行占据支配地位。

与发展中国家相反，发达国家要素结构的突出特征是拥有相对充足的熟练劳动力和资本，其比较优势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企业通常规模庞大，对外部融资的需求更大。由于发达国家已处于或接近技术前沿，企业需要在产品研发与创新上支出更多，并且承受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高风险，较大的规模使企业能够负担向市场提供标准化财务信息的（或多或少的）固定支出，而专业金融机构得以获得足够的收入，从而可以向公众提供专业的财务和审计信息。在标准化财务信息可得的前提下，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大银行就成为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资金提供者。

⁶⁴ 金融系统的功能实际上是金融结构的供给面，不同的金融结构便对应于不同的金融功能组合。新结构金融学强调了产业结构决定的金融功能的需求面，以及需求和供给的有效匹配。

⁶⁵ 传统的理论强调了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忽略了金融结构的重要性。然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也不外乎是前述默顿对金融体系六大功能在增长背景中的体现而已（可参见阿洪和赫瓦特（2009）《增长经济学》第六章“金融与增长”的文献注释，第120页；以及莱文（Levine, 2005）的综述。

总之，对经济发展处于某一特定阶段的国家而言，某种特定的金融机构将会更有效地动员和配置资本。换言之，在经济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存在一个特定的最优金融结构，这一最优金融安排的组合方式及其相对权重能够将金融资源最高效率地配置于最优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中的竞争性部门的企业中。发展中国家最优金融结构的突出特征是银行（尤其是小银行）的地位比证券市场更重要，发达国家情形正好相反。而且，最优金融结构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随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要素禀赋结构会发生变化，最优产业结构和最优金融结构也会相应改变。因此，没有哪一个特定的金融结构是普遍适用于各国的。⁶⁶国家的政策往往不顾自身经济结构状况偏爱大银行和股权市场，但新结构经济学建议，这些收入较低的国家不应复制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金融结构，而应将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作为其金融系统的基础，以使得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小企业能够获得足够的金融服务。随着产业升级，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越来越依赖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型银行和复杂的股权市场也将在这类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⁶⁷

4.4 新结构区域经济学⁶⁸

区域经济学是经济学与地理学交叉而形成的应用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一词常作为区域经济学的同义词。当区域经济学的课题特别涉及到城镇时，则使用城市经济学一词。区域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尽管有诸多不同的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理论，但新结构区域经济学更加强调符合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城市化以及考虑发展中国家现实约束条件的区域发展战略。

二元经济是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议题，提出二元经济概念的阿瑟·刘易斯(Lewis, 1954)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传统发展经济学将二元经济视为发展中国家给定的特征事实，并未揭示二元经济形成的根本原因，也并未找到发展中国家解决二元经济行之有效的办法。⁶⁹战后，刘易斯的开创性研究发现：许多贫穷国家的传统农业与非正规部门集聚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的存在与否不会影响边际产出，城市正规部门能够以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招到其所需的劳动力。因此，经济发展的过程在早期经典二元经济理论中就是传统农业与非正规部门中剩余劳动力被城市正规部门不断吸收的过程，该发展阶段被称为刘易斯阶段以区别于（新）古典阶段，过度阶段被称之为著名的刘易斯拐点。在刘易斯的开创性研究十年之后，后来与刘易斯同获诺奖的舒尔茨从危地马拉和印度的传统农业中发现农民“贫穷而有效率”，质疑了经典二元经济理论中零边际产出的剩余劳动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向农业投资以及让农民积累人力资本来“改造传统农业”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其实，“好几代的发展经济学家都强调把提高农业生产率作为成功的发展战略的一个必要部分。例如，罗斯克(Nurkse)认为‘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革命，壮观的工业革命就不可发生。’罗斯托(Rostow)认为‘农业生产率的革命性变化是成功的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这种观点似乎已经在发展经济学中获得了公理的地位”（梅尔和劳赫，2004）。⁷⁰然而，发展经济

⁶⁶ 德米古·昆特(Demirguc-Kunt)等(2011)采用分位数回归法对70个国家1980-2008年的数据分析支持这一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回归技巧不同于前述X理论范式下的增长回归，其以OECD样本对金融结构关于发展水平回归拟合出最优金融结构，然后以此为标杆计算出每个国家偏离最优金融结构的缺口，再以该缺口（即以X变量对最优的X变量值的偏离程度作为“新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发现其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⁶⁷ 林毅夫等（2014）也对偏离最优金融结构的原因进行了总结：第一个因素来自政府领导人的理念，第二个原因来自于那些深信金融自由化的好处并相信金融体系可以跳跃式发展的政策顾问，第三个原因是政治因素。

⁶⁸ 本节为第九章的简要概述。

⁶⁹ 对二元经济理论半个世纪历程的总结可参见腾珀(Temple, 2005)的综述。

⁷⁰ 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曾经也是这样推荐反贫困政策的，如世界银行2001年的发展报告。

学的另一先驱,我国著名经济学前辈张培刚(1992)就指出,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在实现经济腾飞和二元经济转型时并没有发生壮观的农业革命,其发展战略是通过城市偏向政策推动工业化创造大量非农岗位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削减农村贫困(章元,许庆,邬璟璟,2012)。总结于中国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因此受到了主流发展经济学家的质疑,克鲁格(2011)指出:“在大多数国家,只有农业生产率提高时农村劳动力才会被吸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似乎将增长等同于工业扩张,而忽略了农村地区劳动力(和土地)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林毅夫(2014,第52页)则回应道:“我对经济发展的看法有些许不同:非熟练的农业劳动力向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就是结构变迁的一种形式,而这种结构变迁是不会自发进行的。我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积极行动以管理劳动力需求:政府确实需要促进现有的和新兴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沿着新结构经济学所指出的路线增长。没有这样的行动,许多农村外出移民将会失业,就像非洲、拉美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一样”。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如果政府推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经济中单位资本吸纳的劳动力最多,城市就业最多,城市化水平最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少,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相反,如果政府实施以赶超为目的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则经济中单位资本吸纳的劳动力减少,这就必然导致更低的城市就业率和更低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吸纳劳动力减少将导致农村劳动力无法向城市转移,农业从业人员增加,农村平均工资水平下降,这就将导致更大的城乡工资差距。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仅对当期的城市就业水平和城乡工资差距有影响,长期的就业和城乡工资差距也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落后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降低资本积累率,直接导致更低的城市就业增长率和更慢的城市化进程,进而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更慢,导致更持久的城乡收入差距(陈斌开和林毅夫,2010,2013)。新结构区域经济学认为二元经济需要重新放在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才能发现其深层次的结构关系。付才辉(2014)结合人力资本结构的二元经济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了农村就业增长率,但提高了农民的工资增长率,提高了城市初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率,但对农民工就业增长率存在倒U型影响,对城市高级劳动力就业存在U型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增长放大了城市高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率,但却削弱了初级劳动力对高级劳动力工资增长的驱动作用。人力资本增长会放大城市部门内部的工资差距而产业结构升级却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初级劳动力工资的城乡差距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会逐步消失,人力资本增长会放大城市高级劳动力与农村初级劳动力工资差距而产业结构升级却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农村部门转型驱动的增长将变小,初级劳动力驱动的增长将变小,但人力资本驱动的增长将变大。此外,诸如备受诟病的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和户籍等隔离城乡的制度安排,其实也是在扭曲的结构变迁中内生形成和演化的。⁷¹

除了城市化之外,经济活动在地区之间的分布也是新结构区域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除了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应用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根据其禀赋特征进行因地制宜和区域协调发展之外(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新结构区域经济学更强调发展中国家采取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以及产业集群等渐进式空间发展战略。以中国为例,在1979年向市场经济转型时,经商环境差⁷²,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糟糕⁷³。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应该一步到位,而不必优先支持特定部门和地区。相反,中国政府动员其有限的资源和实施能力建立了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在特区和园区内部,基础设施瓶颈得以缓解,经商环

⁷¹ 林毅夫和余淼杰(2009)计量分析了赶超战略内生形成的城乡或工农价格剪刀差。张天华和付才辉(2014)计量分析了城乡经济结构变迁对户籍制度演化的定量影响。

⁷² 在历经三十多年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2013年的经商环境指数世界排名91位,依然靠后。
(<http://www.doingbusiness.org/rankings>).

⁷³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0年跨国投资》报告,中国的投资环境在研究样本87个经济体中垫底。
(<http://iab.worldbank.org/~media/FPDKM/IAB/Documents/IAB-report.pdf>)

境也变得富有竞争力。⁷⁴经济特区能够显著地促进园区内部和周边企业的生产率（林毅夫、余淼杰、户德月，2014），以及有效提升制度质量（黄玖立、吴敏、包群，2013），尤其是开发区设置的目标行业符合当地比较优势时，其积极作用尤为明显（李力行和申广军，2015）。

4.5 新结构国际经济学⁷⁵

国际经济学包括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其中国际贸易属于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贸易基础、贸易条件以及贸易利益的分配）、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策（汇率理论与制度、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与政策，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要素流动（资本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等。⁷⁶新结构国际经济学着重研究结构变迁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以及后者对结构变迁的反作用。⁷⁷

对于外贸，旧结构经济学曾有多种研究思路，但它们都一致认为，与全球经济相融合必然会固化现有的世界权力体系，在这个权力体系下，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主宰发展中国家并剥削其经济。为摆脱这种依赖陷阱，旧结构经济学家建议优先考虑进口替代战略，让发展中国家先在封闭的、受保护的环境中发展，直至其现代产业有能力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世界市场竞争。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一样，都认为进出口内生取决于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后发优势，达到比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更快的技术进步速度和结构转型速度。⁷⁸开放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收敛至关重要。然而，新结构经济学也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攀登产业阶梯的时候，往往面临着旧结构经济学进口替代战略所留下的诸多扭曲。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建议贸易自由化应该采用渐进、双轨的方法。

对于外资，旧结构经济学认为世界以中心—外围关系为特征，倾向于认为外国资本是工业化国家及其跨国企业用以维持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有害的控制的工具。旧结构经济学因此倡导对一切形式的国际金融流动予以严格管制。新古典经济学赞成开放资本市场或使其自由化，以期实现更为有效的储蓄配置、更大的投资多样化可能性、更快的经济增速以及更为缓和的经济周期。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跟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因为它的目标投资方向往往就是与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而且，外商直接投资一般都会带来技术、管理、市场渠道和社会网络，这些正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也是其产业升级所必需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应成为整体发展战略的一个有益的组成部分。相反，资产组合投资快速进出，金额巨大，主要从事投机活动，会引起泡沫和经济波动，因而在发展中国家不应受到鼓励（Lin，2015）。

理论上讲，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回报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低，资本流动到发展中国家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对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有利的，对发达国家而言资本的回报率会提高。这样的自由流动应该是双赢的，受欢迎的。不过诺奖获得者卢卡斯根据观察发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实际是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到资本丰富的发达国家，而非相反，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谜题。新结构国际经济学可以回答 Lucas 谜题：

⁷⁴ 根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06 年版）》，截止到 2006 年，我国有国家级开发区共计 222 家，其中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 49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53 家、保税区 15 家、出口加工区 58 家、边境经济合作区 14 家以及 33 家其它类型的国家级开发区。曾智华(Zeng, 2010)主编了一本比较全面细致总结中国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文集可供参考。

⁷⁵ 本节为第十章的简要概述。

⁷⁶ 国际经济学方面的经典教材可参考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2011)。

⁷⁷ 结构变迁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影响便是典型的问题。王泽填和姚洋(2009)利用 1974-2004 年的面板数据识别了农村人口的变化通过压制本国物价的作用，破坏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发挥作用的机制。

⁷⁸ 王勇（2014）探讨了贸易对结构变迁的一些可能影响机制。

资本为什么会从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流向资本充裕的发达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没有得到改善，以支持产业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升级，或进行赶超去支持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抑制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所积累的资本可能面临收益递减的困境，导致发展中国家资本收益降低，资本就流向了发达国家。

与资本供给面的视角不同，金刻羽(Jin, 2012)也分析了产业结构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其强调产业结构的选择对资本的需求影响，进而影响资本的国际流动。其认为，发达国家发展的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资本的需求相对劳动更多；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本的需求相对劳动更少；因此，产业结构是驱动资本国际流动的重要因素。尽管该理论并未进一步分析禀赋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但与新结构国际经济学分析思路是一致的。

4.6 新结构经济周期理论⁷⁹

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包括了短期经济周期和长期经济增长两大部分的研究内容。⁸⁰长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研究议题已经整合到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其他研究领域之中，新结构经济周期理论主要从结构变迁角度研究经济周期的内生形成机制以及诸如宏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反周期政策如何通过结构性应用达到反周期和长期增长的统一。⁸¹

如前所述，大部分前沿内部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过程是“走走停停(Stop-Start)”（琼赫斯和奥尔肯，2008），表现出一种“周期即趋势”的特征（厄贵阿和贡皮纳什，2007）。过去大都认为，长期增长差异大多可归因于有的国家增长慢，有的国家增长快，而事实可能恰好相反，通常的增长差异几乎都源于一个国家本身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率变化。换言之，发展中国家不是缺乏高速增长，而是缺乏持续性增长。这完全与发达国家使用的标准趋势周期模型不同（普利切特和萨默斯，2014）。

除了经济周期的生成机制之外，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效果可能会不同，原因在于两类国家在利用反周期支出进行促进生产率的投资方面的机会不同。一般而言，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实物基础设施是一个紧约束；而在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以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在这种情况下，衰退就将成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绝佳机遇，原因有三。第一，这些投资不仅增加了短期需求，也提高了长期经济增长率；第二，投资成本低于正常时期；第三，未来经济增长率的提升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将弥补这些投资成本，从而避免李嘉图等价陷阱。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够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遵循本国比较优势来促进产业发展，其经济强劲增长的可能性很大，贸易方面将表现良好，需要政府补贴的无自生能力的企业也会较少，因此其经济将更有竞争力，财政状况和对外收支也会更好。在这种情况下，该经济发生内源性危机的次数将更少。而如果经济受到外部冲击的打击，比如本次全球经济危机，政府将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来执行反周期的财政刺激政策，对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事业进行投资。这些公共投资将提升经济的增长潜力，降低私人部门的交易费用，提升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并在未来产生足

⁷⁹ 本节为第十一章的简要概述。

⁸⁰ 尽管对于如何分析短期宏观经济现象以及宏观经济学的边界尚未如基本的微观经济学那样有广泛的共识，但是对于动态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模型(Workhorse)并未有太多争议，包括索罗模型、拉姆齐模型、代际交叠模型、技术变迁模型和技术采纳模型(阿西莫格鲁，2009，前言)。尽管短期宏观经济理论流派林立，主流的代表性周期理论包括（新）凯恩斯主义、理性预期和实际周期理论（RBC）等。

⁸¹ 现有宏观经济学理论以产业升级时国民经济中每个企业对于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存在何处没有共识为暗含前提，但是，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很容易对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产生共识，投资上出现“潮涌现象”，并伴随此现象出现产能过剩和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所以，有必要放松现有的暗含前提，重新构建一套新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探讨投资的“潮涌现象”对发展中国家的物价、就业、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影响，作为政府制定财政、货币、金融、外贸、产业发展等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参考（林毅夫，2007）。

以清偿初始投资成本的税收。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利率政策完全有可能被用做反周期的调控工具，也完全有可能在衰退时期被用做鼓励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升级投资的工具。这些措施将有利于经济未来的生产率增长。对于发达国家，在衰退和产能过剩时期，以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消费经常是无效的，尤其是在经济中存在产能过剩、有利可图的新产业投资机会很少、人们的预期普遍比较悲观、失业率居高不下、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经济很有可能已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这时名义利率已接近于零。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是不太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即使国内现有产业出现产能过剩，产业升级和产业多样化的空间仍然很大，在衰退时期，只要利率足够低，这些国家的企业就会有激励进行能够提升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的投资。况且，这些国家通常面临很多基础设施瓶颈，在萧条时期降低利率将促进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新结构宏观经济学主张，在经济衰退中，货币政策应该着眼于刺激那些能够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在衰退时应该不仅仅降低利率（如多数情况下标准的泰勒规则）。它还意味着，货币当局需要诉诸暂时的利率补贴、灵活的信贷配置规则、类似的限时政策工具等手段，政策指向是被开发银行看作紧约束的基础设施项目，最好是那些处于回报最大、政治经济约束易于管理的地理位置上的项目。

4.7 新结构转型经济学⁸²

转型或转轨经济学是伴随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的消解、市场经济逐步形成这一过程而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科。转轨经济学（转型经济学、过渡经济学）试图理解和解释近二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兴起并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变迁，主要研究经济体制比较的基础，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市场化改革的方法及其前景。⁸³比传统的转轨经济学范畴更加广泛，新结构转型经济学研究扭曲的内生形成机制及其行之有效的消除方式，而且还研究发展战略的动态调整及其改革的方法与策略（付才辉，2014）。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为提高经济绩效，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转型伊始，中国和越南就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却出现了经济急速下滑以及社会发展大都恶化的现象。为什么前苏联东欧以及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却导致了经济衰退、停滞和频繁的危机？之所以误入歧途，不在于建立开放与竞争性的市场体制目标，而在于没有意识到转型之前经济体制扭曲的内生性质。⁸⁴

华盛顿共识改革的目标是消除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政府扭曲和干预，并建立运转良好的市场体制。如果这一目标实现了，市场竞争便会决定各种产品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那么相对价格就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相对稀缺性。给定相对价格，市场竞争会引导企业选择与由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因此，经济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繁荣。然而，在转型经济中存在大量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没有政府保护和

⁸² 本节为第十二章的简要概述。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对转型经济学专门做了反思，提出新转型经济学(Lin, Justin Yifu,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visited: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2014, p.1-18.)。

⁸³ 热若尔 罗兰的《转型与经济学》做了很好的综述。

⁸⁴ 林毅夫等在 1994 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就系统论述了赶超战略如何内生了一系列价格扭曲：在建国之初前，禀赋水平非常低，依靠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税收和补贴手段将无法实现偏离禀赋结构的重工业赶超战略目标，就需要建立一套替代竞争性市场相对价格体系的动员资源的计划体制来支持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发展；提高重工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同时人为地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包括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金、原料以及进口的机器设备；相应的配套政策还包括低利率政策、低汇率政策、低工资、低原材料价格政策、低农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及服务价格政策等。

补贴，这些企业不可能在开放和竞争性市场中存活。如果只有少许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它们的产值和就业有限，一步到位地消除所有政府干预和扭曲的休克疗法也会可行。废除政府保护和扭曲之后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就会破产。然而，最初被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新创造的就业机会能超过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破产产生的损失。因此，在实施休克疗法之后，产出和就业最初会有所下滑，然后便会实现动态增长。

然而，如果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目很大，其产值和就业可能占国民经济较大份额。由于大规模的破产和就业剧烈下滑，休克疗法可能会引起经济紊乱。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状况，或者出于国家安全与民族自尊心而维持这些“先进”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就只能别无选择地时常通过较之先前的扭曲更加隐性的方式继续提供保护和补贴。那么，这就将先前的次优扭曲改变成第三优或第四优扭曲。即便这些企业私有化了，预算软约束问题还会依然存在。由于私人业主为了补贴和保护有更大的游说激励，对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补贴甚至还会增加（林毅夫和李志赟(Li)，2008）。实际上，这便是发生在俄罗斯和前苏联东欧诸国的情况。最终，这些经济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休克而无治疗的尴尬境地。⁸⁵

在面临内生形成的扭曲和存在大量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经济体的情况下，像中国政府采纳的渐进双轨法会优于休克疗法。没有像华盛顿共识建议的那样立即取消所有的补贴，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提高了农民和国企员工的激励，同时在优先发展的产业保留过渡期补贴。合作社被家庭联产责任制取代，在国企中引入利润留成和管理自主权，使得农民和工人具有部分剩余索取权。这样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业和工业领域的激励和生产效率。政府允许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合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使用政府控制的资源来投资过去被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政府要求农民和国企完成以国家规定的价格上交一定产品配额的义务。前一类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后一类改革确保政府有能力继续补贴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因此，经济稳定和动态增长就能够同时实现。

最终，在动态增长路径上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逐步下降，对国企的补贴要求也随之降低，政府能逐步消除价格扭曲和行政配置，并私有化中小规模的国企——它们大都处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并与中国的比较优势一致。虽然没有大规模的私有化以及乡镇企业的产权并不明晰，但市场竞争增强，经济绩效得以改善。越南的转型策略与中国类似。通过谨慎和渐进的改革，中国和越南已经能够用市场体制取代传统的苏联体制，并且同时维持了良好的稳定和增长。毛里求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也采取了双轨法来开放其违背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经济，毛里求斯建立了出口加工区鼓励出口，同时对国内进口竞争部门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进行进口限制保护。这种改革策略让毛里求斯的 GDP 在 1973 到 1999 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5.9%，这是非洲例外的成功故事。

因为计划经济、转型经济以及发展中经济的许多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所以在应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这些经济中的问题时就有必要放松企业具备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林毅夫, 2002)。放松自生能力的假设将会丰富新古典经济学并有助于重新界定政府在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角色。当经济中的大量企业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上没有自生能力时，政府需要设计务实的转型战略。通过帮助单个企业克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该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促进根据比较优势变化所进行的产业升级。自前苏联东欧诸国

⁸⁵ 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经济中的份额差异或许能够解释萨克斯推荐的休克疗法为何在玻利维亚取得成功而在东欧和前苏联却失败了。玻利维亚是个贫穷的小国，因此政府能够动员以补贴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资源较少，经济中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比重也相对较少。斯蒂格利茨(Stiglitz, 1998)就质疑了华盛顿共识的普遍适用性。他指出，华盛顿共识主张使用少量的政策工具，诸如宏观稳定、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来实现相对狭隘的经济增长目标。他鼓励政府使用更加广泛的政策工具，例如金融监管和竞争政策，来实现相对宽泛的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公平的收入分配等等。斯蒂格利茨的主张基于信息不对称和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需要。然而，他并没有讨论发展中经济和转型经济中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以及自生能力的缺乏对转型路径和政策选择的含义。

和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一些经济学家呼吁是时候了结转型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子领域的时候了。然而,在转型经济体中依然存在大量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和结构问题,更重要的是,结构转型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所以需要新的转型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为新转型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分析基础。

在发展战略转型更一般的意义上,正如拉里斯(Ranis)对东亚奇迹的总结:“关键的和具有说服力的一点是决策者持久的可塑性,在过去40年,决策者总能够在每一个可以识别的增长转型的阶段上对经济正在变化的需求做出政策的相应改变。由于这个可塑性,整个系统得以避免失去动力并能够在每一个阶段的末尾重新驶入轨道……每个十年有每个十年的挑战,每十年政府都能够做出政策的转变,用库茨涅茨的话来说,这些政策改变是为了适应而不是梗阻私人经济所要求的变化”。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随着我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过程中,几乎所有不适宜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都必须进行实时调整。新结构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议题远比传统的转型经济学要普遍和客观得多。

4.8 新结构制度经济学⁸⁶

新制度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研究各种行为规则的经济学子学科,由科斯、诺斯以及威廉姆森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创立。⁸⁷即便在主流理论范式内部,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也只不过被视为增长的直接原因或增长本身,深层次的制度安排则被视为根本原因(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2005)。

由于制度的复杂性,对制度的研究至今方兴未艾。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制度经济学开始传入中国,成为解释中国问题并对政策改革最具影响力的流派,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依然为制度研究的理论创新预留了巨大的空间。⁸⁸从本质上讲,制度塑造一个经济体的激励结构,而参与人的支付矩阵很大程度上是嵌入到产业结构之中的。总的来讲,目前的新制度经济学缺乏对制度变迁的产业结构变迁基础的系统研究(付才辉,2010;付才辉和林毅夫,2014)。新结构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最优的制度安排结构及其变迁的前因后果以及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新结构制度经济学认为,不管发展的水平高低如何,一个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是内生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和交易规模的扩大,人民财富的普遍增长,相应的规范市场交易和人与人、人与政府互动的制度安排也必须相应地与时俱进地完善。制度结构可以分为契约安排和制度安排两个层次,⁸⁹对于制度变迁的方式存在两种:诱致型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⁹⁰

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中,首先将制度纳入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经济的禀赋要素的一

⁸⁶ 本节为第十三章的简要概述。

⁸⁷ 可参阅可参见新制度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门那德(Menard)和希尔里(Shirley),2008)。

⁸⁸ 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创新过程可参见付才辉等(2013)年的概述。

⁸⁹ 现实中的制度安排丰富多彩,不同的制度安排在理性深度、策略性质、经济后果、变迁动力、变迁频率、变迁难度等方面各不相同。威廉姆森(2000)提出的制度分层框架为将多样性的制度进行分门别类提供了便利。根据康芒斯将制度分析的基本单元视为“交易”的思想,付才辉等(2010,2011,2012)则进一步将这个分层框架压缩为制度环境和契约安排,二者的区别在于:一张契约安排只对应一个交易,而一条制度安排则影响多个交易。契约安排和制度环境内部也存在结构关系,不同层次之间的制度安排也存在结构性关系。

⁹⁰ 许多人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缺乏对制度的关注,其实这是误解。林毅夫在增订版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新增了第5章“一个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和强制性变迁”(该文也以《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为名收录于科斯等主编的《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一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最初于1989年发表于加图学刊(*Cato Journal*))。

部分。⁹¹基础设施包括硬件（有形的）基础设施和软件（无形的）基础设施。硬件基础设施的例子包括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信系统、电网和其他公共设施等。软件基础设施包括制度、条例、社会、资本价值体系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等。基础设施影响每个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投资的边际收益。其次，随着发展中国家沿产业和技术阶梯拾级而上，许多其他变化都随之而至：企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复杂，资本需求增加，生产和市场规模也有了变化。远距离市场交易越来越多。因而，为了给新升级的产业中的企业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一个灵活、平稳的产业和技术升级过程就需要教育、金融、法律和硬件基础设施方面同时做出相应改进。显而易见，单个企业无法有效地内部化所有这些变革成本，而多个企业之间为了应对这种挑战进行的自发协调往往也不可能实现。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集体行动，至少需要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与工业企业二者之间协调行动。这样，就把政府拉了进来，政府要么自己进行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要么就需要积极协调各方的行动。

在制度分层方式与制度变迁方式的基本制度结构理论研究基础上，新结构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在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界定市场主体之间关系的契约安排，以及界定市场主体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产权安排的内生变迁过程及其对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

随着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生产结构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细密，资产专用性越来越高，交易的深度和范围越来越大，市场主体的缔约难度也随之变大，对传统基于熟人关系的非正式规则依赖越来越小，对法律法治正式规则的需求会增加。⁹²法律法治作为软的基础设施，不但具有公共品的外部性，而且国家作为契约的第三方强制实施者具备比较优势。因此，国家应该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加强法律法治建设，降低市场主体的缔约成本，建设基于正式法律规则的社会。

上述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强调的适宜性制度的观点可能面临格申克隆(Gerschenkron)的疑问：为什么政府不在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选择偏向投资型策略的制度和政策，然后随着国家趋近于前沿而转换至支持创新的政策？阿西莫格鲁等（2006）认为，问题的答案在于政府干预的政治经济。偏向于投资型策略的政策可以产生并增加政府自身的支持者。当经济权力购买政治权力时，要想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很强大的选区中逆转上述政策是困难的。因此，经济将会停留在“不适宜制度”的陷阱中。这种非收敛陷阱及其与政治经济和既得利益的相互影响可能反映了拉丁美洲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和秘鲁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经验。进口替代和保护主义的政策使得这些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前经历了较快的增长，但是同样的政策却导致了之后的停滞，结果这些拉丁美洲国家被一些更加灵活的东南亚经济体所超越，比如中国香港。不同于民众之间的契约关系，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产权关系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第三方保证可置信的承诺，即政治科斯定理不成立——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不能由科斯式谈判来解决（阿西莫格鲁，2003）。在激励相容的条件下，政府可以对制度安排进行有效率的动态调整，但在结构变迁中政府和民众利益不相容的情况更加普遍（付才辉，2014）。因此，在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着力研究结构变迁过程中政府的动机、行为与能力。⁹³从改革策略上讲，新结构制度经济学

⁹¹ 新国际贸易理论就认为制度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那些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在生产技术复杂和专用性程度高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勒维恩科(Levchenko), 2007）。

⁹² 不同产业对制度的依赖是不同的，技术复杂性程度越高，非定制化程度越大的产业的交易复杂性越大，对合约执行要求越高（努恩(Nunn), 2007）。

⁹³ 新结构经济学中是假定所有行为者，包括政府领导人，是理性的，其行为、选择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目标的。……，政府领导人的个人目标有二：一是长期执政；二是在长期执政的目标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追求青史留名。能够最好地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的选择是在其执政期间给其治理的领地带来繁荣，使百姓人人安居乐业。如果真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这样的政治领袖就会表现为‘好人’。但是……，政治领袖很容易犯下‘好心干坏事’的错误，国家和百姓蒙受损失和不幸。结果为了继续执政，这些政治领袖就很可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去拉帮结派、收买利益集团以巩固其地位，以及腐败、贪污积累个人财富以备下台后的生活或东山再起的资本。结果就变成‘坏人’。在理性人的假设下，政府领导人是‘好’还是‘坏’并非必然，关键

通过研究结构变迁对利益格局分布的影响以具有可操作性的激励相容的诱致型制度变迁策略以及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顶层设计方案。此外，新结构制度经济学也研究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社会转型和社会政策等非正式制度安排演化问题。

4.9 新结构国际发展学⁹⁴

从二战后开始，在发展经济学 1.0 版本（结构主义）和发展经济学 2.0 版本（新自由主义）发展思潮和发展政策的指导下，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发展止步不前，迷失了数十年(伊斯特利(Easterly,2001))。出于黔驴技穷的无奈与人道主义的考虑，西方发达国家与世界各发展机构越来越多地把发展议题转向以教育和健康为重点项目的援助。国际援助的有效性也越来越令人失望，⁹⁵使得人们开始对发展项目和方案的效果进行更严格的评价。这就产生了发展研究的一条新思路，由麻省理工学院贫困研究室⁹⁶的经济学家们领衔推动，其目的是通过随机化控制试验以基于科学证据的政策来减贫。该趋势可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 2.5”版本。⁹⁷例如，北非国家近来在教育领域取得了积极进步，但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创造上陷入停滞，使这条道路的可行性也遭到质疑。尽管随机化控制试验有助于理解一些特定的微观发展项目在特定地点和时间的效果，但它们的出发点往往不是在战略上清晰地评估一个特定的方法如何填补我们最为迫切希望知道的知识空白。

与简单国际援助不同，新结构经济学在国际发展领域，主张通过研究“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的造血方法帮助发展中经济体脱贫致富。与前两波发展思潮不同，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应该从发展中国家现在有什么（即其要素禀赋）出发，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即其比较优势），规划把现在能做好的做大做强，以此实现逐步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目标。不论基础设施和经商环境天生多么糟糕，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即刻登上动态的结构转型和增长之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必须采取务实的方法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和实施能力来推动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这样才能保持相对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为了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政府可以创建具有良好基础设施和经商环境的工业园区或经济特区。

在全球产业周期变化背景下，每个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都可以识别其面临的全球产业

在于是否有一个可以指导政府领导人做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政策，真正能够给国家带来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福祉不断增加，使其长期执政和留名青史的个人目标和全体人民的目标能够同时实现的理论。而且，不管在任何体制下，政府领导人的施政都由一定的自由度，如果存在一个可以指导政府领导人在存在扭曲的情况下，以帕累托的方式进行渐进双轨的改革，领导人也会不为利益集团所绑架，以务实渐进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和繁荣(林毅夫，2013)。

⁹⁴ 本节是第十四章的简要概述。林毅夫的《从西潮到东风》一书的第三部分“贫穷国家如何实现追赶：雁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介绍了新结构国际发展学的思路（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中信出版社，2012 年）。

⁹⁵ 伊斯特利（2003，2006）对援助有效性的质疑在西方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

⁹⁶ <http://www.povertyactionlab.org/>

⁹⁷ 这个方向可以视为基于计量经济学的国际发展，最近也有了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国际发展（例如 2015 年世界银行最新的世界发展报告《心智、社会与行为》(Mind, Society and Behavior)，提出了三条行为经济学原则指导发展政策干预：1、自动思维。大部分思维都自动的，即快速、自动、不费力、联想式的。而对各种选择进行权衡的分析性思维要少于自动思维。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使用一些认知捷径。因此，做决定时所处情境的微小改变就可能对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其认为认识这点，对于理解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设计更好的政策都具有深远意义；2、社会思维。人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很多人有着对公平和对等的社会的偏好，也具有合作精神。但同时，人们往往是有条件的合作者——只要其他人合作，他们就愿意合作设计合理的制度和干预措施可以支持和推动合作行为的发生。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可以成为新的政策和干预措施的基础；3、心智模型思维。人们思考时，通常不会自己发明新的概念，而是使用所属社区的概念、分类、身份、原型、刻板印象、因果推断和世界观。心智模型影响着人们能想到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解释自己想到的事物，它具有持久性，并且对个人选择和总体社会结果有着重大影响。针对心智模型采取干预措施，其认为可以促进发展目标的实现）。

窗口机遇期，通过工业园区的局部渐进式改革消除瓶颈，承接符合禀赋结构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迅速登上持续的经济发展之路。以中国为例，在 1979 年向市场经济转型时，经商环境差，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糟糕。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应该一步到位，而不必优先支持特定部门和地区。相反，中国政府动员其有限的资源和实施能力建立了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在特区和园区内部，基础设施瓶颈得以缓解，经商环境也变得富有竞争力。

虽然在转型初期有低成本的劳动力，但是中国缺乏利用这个优势生产具有合格质量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知识。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中国各个地区的各级政府四处寻求国外投资者，鼓励他们在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内投资。采取这种办法，中国迅速建立起了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成为了世界工厂。在局部地区取得的成功为政府改善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和消除扭曲提供了资源和条件。这不仅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东亚其它经济体发展成功的奥秘。

华坚鞋厂在埃塞俄比亚的快速成功生动地表明前述奥秘在其它发展中国家照样管用。根据世界银行的《非洲的轻工业》研究，埃塞俄比亚制鞋业的工资率只有中国同行业的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将近越南同行业的一半；然而，埃塞俄比亚的劳动生产率大约为中国的 70%，与越南大体相当。由于劳动成本大约只有中国总成本的四分之一，埃塞俄比亚在制鞋业上很有竞争力。但是，2010 年，中国的制鞋工人有 1900 万，越南有 120 万，而埃塞俄比亚只有区区 8 千人。2011 年 3 月，埃塞俄比亚已故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在得知这些发现和中国工业化方法之后，于同年 8 月来到深圳邀请中国的制鞋厂商去埃塞俄比亚投资。华坚公司的管理层于 2011 年 12 月访问了亚的斯亚贝巴后发现商机，于 2012 年 1 月便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东方工业园开设了鞋厂。从最初的 550 个埃塞俄比亚工人，2012 年 12 月迅速扩充到 1800 人，然后再到 2013 年 12 月达到 3500 人。到 2012 年底，华坚公司已经让埃塞俄比亚的鞋业出口量翻番。2012 年之前，埃塞俄比亚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很难在轻工业中吸引到出口导向型的国外直接投资。华坚鞋厂立竿见影的成功改变了外国投资者对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面向全球市场出口的潜在轻工业基地的印象。2013 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在亚的斯亚贝巴新建了一个名叫博莱拉明(Bole Lamin)的工业园区。第一期预定建造 22 栋标准厂房，2013 年 8 栋建成，14 栋在建，当年不到 3 个月这 22 栋全部被从事成衣和制鞋的外商所承租。在工业园第一期取得成功后，世界银行提供了 2.5 亿美元 40 年无息贷款来支持第二期、第三期的建设。按照世界银行的经商指数排名，埃塞俄比亚从 2012 年的 125 位跌到了 2013 年的 127 位，尽管如此，上述非凡的成功故事还是发生了。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无需坐等所有的发展条件都具备了才行动。如果政府能够采取前述务实的发展方法，那么来自中国潜在的 8500 万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将使几乎所有低收入国家实现如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在过去数十年那样的动态增长。⁹⁸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动态增长之后，中国现在正处于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阶段，从 2005 年的 150 美元上升到 2012 年的 500 美元，2013 年沿海地区已经超过了 600 美元。中国将不得不步先前成功经济体的后尘，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低收入国家。事实上，这已经发生了。到 2009 年底，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达到 93 亿美元，制造业占了较大份额（22%），仅次于矿业（29%）。此外，中国也正在和埃及、埃塞俄比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与赞比亚建立经贸合作区。中国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巨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广大低收入经济体新一轮国际发展的窗口机遇期，而中国发展经验却是把

⁹⁸ 虽然每个中高等收入经济体都可能存在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可以转移到低收入经济体，但是这次的国际发展窗口期与过去的雁行模式不同，中国依然成为产业转移的领头龙（林毅夫，2012；哈瑞古驰(Haraguchi)和热宗家(Rezonja)（2009）利用 1963-2006 年 148 个小国 18 个制造业的数据识别了雁行模式；在雁阵模式的基础上，付才辉和林毅夫(2014)进一步通过合并 UNIDO、WDI、PWT 的数据，按照 8 种口径估算了 156 个经济体制造业失去比较优势的过剩产业就业人数和符合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就业人数缺口，2010 年中国的过剩人数最大口径达到 4330 万，最小口径也达到 1460 万；非洲、印度和拉美是制造业缺口最多的三个地区，一些发达国家也面临再工业化的缺口。

握住发展机遇的方法（林毅夫和王燕(Wang)，2014）。

与现有国际发展文献的视角和思路不同，新结构国际发展学用前述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帮助低收入贫困经济体登上持续动态的结构转型升级之路，尤其是用新结构经济学务实的办法充分利用全球结构变迁的产业转移机会，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窗口机遇期。

4.10 新结构经济学对其他结构问题的研究

新结构经济学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外延，除了上述研究领域之外，新结构经济学的原理和政策思路还可以应用到经济学的其他领域。例如，新结构经济学还可以应用到公共经济学领域，对资源租金管理进行研究。在资源丰富的国家，新结构经济学建议，从资源商品收入中拿出适当比例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社会资本投资，并对非资源部门的先行者进行补偿以促进结构转型。为达到最大效果，用这些资源性收入进行的投资项目应该有助于消除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的紧约束，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教育部门。微观经济分析表明，即使穷国工厂里的出厂成本跟富国相同，效率低下的基础设施也将导致这些穷国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非洲国家的货运成本和保险成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50%，道路货物运输时间是亚洲国家的 2 到 3 倍。由于缺乏金融资源和合适的政策框架，许多这类国家往往无力维持必要的投资水平和维护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政府财政措施不应是将自然资源收入存入主权基金并投资于外国股权或外国项目，而应将其相当大的比例投资于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的国内或地区性项目，比如那些刺激新制造业发展、使产业多样化、提供就业，以及使得产业不断升级的潜力有所提升的项目。⁹⁹又例如，新结构经济学也可以解释环境经济学中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每个国家在低收入阶段一定以农业为主，生产非常分散，能源使用非常少，排放也非常少，环境也非常好；经济发展进入到制造业阶段，能源使用密度提高，排放密度也增大，而且又比较集中，污染会变得严重；经济继续发展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服务业能源使用密度低，排放少，加上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资金充裕，环境治理能力强，环境也随之改善。新结构环境经济学也将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第 5 节 本书的内容安排和使用说明

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威廉姆森在 2009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致辞中谈到的，一门学科的形成需要历经从核心概念的提出到体系形式化再到广泛应用的漫长过程。新制度经济学从科斯 1937 年提出交易费用这一核心概念到 1991 年科斯、1993 年诺斯以及 2009 年威廉姆森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走过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从曾经的边缘全然跻身于当今主流。

新结构经济学从 1994 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以来，体系已然成型。然而，实事求是地讲，新结构经济学要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基本原理和各个研究方向上还有巨大的研究空白需要填补。正如王勇（2013）所言，林毅夫 2012 年新近出版的《新结构经济学》一书绝对不是最后的总结陈词，而只是一个引言。自科斯提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忠告以后，“思想市场”一词在国内学界成为一个热门词汇。¹⁰⁰学者的工作是提出或介绍新的思想，并通过著作、文章、讲演使新的思想成为社会思潮，以引领社会变革

⁹⁹ 这些主张已经反映在世界银行一份资源融资的基础设施研究报告中（哈兰德(Halland)等，2014）。

¹⁰⁰ 林毅夫在 2007 年的马歇尔讲座上对思潮做了专章的讨论，后来出书时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为书名来彰显思想的重要性。诺奖得主舒尔茨在研究近三百年来西方各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时发现：“主流社会思潮塑造社会的制度化秩序……并且，业已建立的制度的失灵反过来会改变社会思潮”。我们所处的社会有许多制度失灵和缺位，确实需要有新的思潮来催生新的制度。不过，舒尔茨也发现，“近三百年来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进行的重要社会变革绝大多数是失败的。”

的方向。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希望能够逐步改变我国经济学教育界思想市场还不够竞争的现状，加强我国经济学学科的自主建设，实现国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理论自信。

希望本书有助于推进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我国自主理论创新的学科建设，指引新结构经济学的后续研究。如果只想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来龙去脉有个概括性的了解，只需阅读第一章绪论即可；如果只需要掌握新结构经济学核心的分析框架和基本原理，还需要阅读第四章；如果还需要深入比较新结构经济学与主流理论在增长与发展核心议题上的研究异同，还需要阅读第二、三章。如果不想通读全书，读者也可以选择性地阅读感兴趣的第五章到第十三章的子学科领域。当然，新结构经济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许多理论假说也还需进一步检验。因此，读者需要带着研究性、探索式的学习态度阅读本书。